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此处有大量书籍免费下载！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袖珍经典

水隐醉月制作

大学的兴起



[美]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 著 王建妮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此处有大量书籍免费下载！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水隐醉月制作

上架建议：文化教育

ISBN 978-7-208-06740-0



9 787208 067400 >

定价：12.00 元

易文网：www.ewen.cc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此处有大量书籍免费下载！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水隐醉月制作

大学的兴起



[美]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 著 王建妮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的兴起 / (美) 哈斯金斯(Haskins, C. H.) 著,

王建妮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袖珍经典)

书名原文: The Rise of Universities

ISBN 978-7-208-06740-0

I. 大... II. ①哈... ②王... III. 高等教育-教育史-欧洲-中世纪 IV. G649.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1521 号

责任编辑 吴书勇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大学的兴起

[美]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 著

王建妮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5 1/32

印张 3.75

插页 4

字数 59,000

版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6740-0 / K · 1289

定价 12.00 元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

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序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于 1870 年 12 月 21 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米德维尔。很小的时候，他就为自己将来精通古代和现代语言并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打下了基础。五六岁时，跟随父亲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16 岁时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后求学于巴黎和柏林，不到 20 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开始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在威斯康星大学执教 12 年之后，哈斯金斯于 1902 年应聘到哈佛大学，直到 1931 年因身体状况不佳退休。1937 年 5 月 14 日在剑桥逝世。

在哈佛任教的漫长岁月里，哈斯金斯逐渐变成了该大学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原因不仅仅在于 1908—1924 年间他一直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院主任一职，最重要的在于他的人格魅力。关于哈斯金斯性格的基本特征，与他关系最亲密的三个同事在他去世时作了最简洁明了的概括：

把历史视为一门自由艺术和一门人文科学的他授课时朝气蓬勃、积极进步，高年级历史专业的学生皆从中受益匪浅，因为每个人都选修他的一门甚至更多课程，在学院辩论会上他独领风骚，许多难题在他那里迎刃而解，从一开始他就显露出一位学院院长所具备的才能，尽管他几次拒绝如此重要的任职邀请。他谈吐幽默风趣，喜爱长时间散步，他是自己交际圈里最受宠爱的人，也是大家最好的朋友，他内心极其虔诚，笃信宗教，很快就使自己变成了哈佛大学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并留名于哈佛伟人史册之中。^[1]

由于具备一名卓越能干的管理者和事务家的天赋，他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哈佛大学。在活跃的学术生涯中，他在美国许多重要学术组织中扮演着带头人的角色，包括美国历史学会、美国中世纪史学会和美国学术联合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极负盛名的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巴黎和平代表团的成员，时任西欧区主席。

哈斯金斯的学术研究集中于 11 至 13 世纪的中世纪盛期，他最早的兴趣之一是研究法国北部的社会制度，在深入细致地调研档案资料的基础上，最终于 1918 年出版了《诺曼社会制度》一书，此书成为该时期英法社会制度的权威性著作。另一个让哈斯金斯感兴趣的广阔领域是

思想和知识的发展，在这个领域里，他尤为关注中世纪盛期的科学史。他撰写了大量文章讨论许多纷繁芜杂的问题，由于对欧洲现已收集的原始资料有深入透彻的了解，因而他能够利用迄今尚未被使用的原始资料，对这些问题作出全新的解释。哈斯金斯毕生研究留下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两本论文集：《科学史研究》（1924年；1927年，第二版）和《中世纪文化研究》（1929年）。不过除了这些专题性研究，他还创作了一部令人异常兴奋的综合性著作《12世纪文艺复兴》（1927年），此书刚一出版就吸引了不同层次的读者。

他的朋友F·M·波威克曾经评价说，“哈斯金斯喜欢做自己的‘推广者’”。^[2]他曾经在哈佛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举办一系列讲座论述“欧洲历史上的诺曼人”的重要性，并于1925年将其出版。1923年，他在布朗大学举办三次讲座概述他对“大学的兴起”的看法，从而为世人提供了一本简明扼要、生动逼真的著作，迄今无人能出其右。

1929年，为庆祝执教40周年，《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的学生中世纪史研究纪念文集》出版发行，其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中世纪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他们的广泛兴趣和独创性反映了他们曾经从导师那里得到的启发和训练。

集合办事高效的组织者、见解新颖的学者和讲课精彩的教师这三种人的品质于一身的人可谓凤毛麟角，而

哈斯金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借用法国中世纪史专家 F·茹翁·德·隆尔格雷的话说，“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的确是美国中世纪史研究复兴的灵魂”。

西奥多·E·莫姆森
康奈尔大学

注释：

[1] 引自 R.P.Blake, G.R.Coffman, and E.K.Rand., *Speculum* 中的讣告, XIV (1939), 414.

[2] 参见 F.M.Powicke 撰写的有关哈斯金斯的文章, 载《英国历史评论》, LI (1937), 653.

目录

序 / 1

第一章 最早的大学 / 1

导论 / 1

博洛尼亚大学与南方 / 5

巴黎大学与北方 / 11

中世纪的遗产 / 18

第二章 中世纪的教师 / 23

学习与教科书 / 23

教学与考试 / 33

学术地位与学术自由 / 42

第三章 中世纪的学生 / 49

信息来源 / 49

学生手册 / 55

学生书信 / 63

学生诗歌 / 69

总结 / 77

文献简介 / 81

索引 / 92

第一章

最早在大学

导论

1

大学是中世纪的产物，犹如中世纪的大教堂和议会。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没有大学——已经连续使用了七八个世纪的“大学”一词所指代的教育机构——虽然听起来或许有点儿匪夷所思。他们有高等教育，但它不是大学的同义语。他们在法学教育、修辞学教育和哲学教育上取得了许多令后人自叹不如的成就，但他们的教育并未发展成永久性知识机构的组织形态。像苏格拉底(Socrates)这样的伟大教师不会发给学生毕业文凭；假设现代的一个学生拜在苏格拉底门下三个月的话，他一定会向他索要一个证书，一个可以证明这件事情的真实的、外在的东西——顺便插一句，这将是苏格拉底对话(Socratic dialogue)的一个绝佳主题。只是到了 12、13 世

纪，世界上才出现了具有我们现在最为熟悉的那些特征的有组织性教育，即以系科(faculty)、学院、学习课程、考试、毕业典礼和学位为代表的教育机构。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现代人都是巴黎和博洛尼亚而非雅典和亚历山大的继承人和接班人。

最早的大学 and 现代大学之间当然存在巨大且显著的差异。在起源时期，中世纪大学没有图书馆、实验室、博物馆，也没有捐助基金和属它所有的建筑物；它可能满足不了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的要求！正如来自美国一所年轻大学的一本历史教科书所言，除了潜意识里带有一点儿地方性色彩之外，它“在物质存在方面不带有一丁点儿对我们来说不言而喻的特征”。依据帕斯奎尔(Pasquier)经典而古老的习惯用语，中世纪大学是“人的组合体”(bâtie en hommes)。这样的大学没有理事会；不颁发任何行事一览表；没有学生社团——除非这所大学本身起源就是一个学生团体——没有学院报刊，没有演出活动，没有体育运动，更没有现代美国学院“校外活动”（它们是美国学院内部不活跃的主要理由）中的任何一个。

尽管差异很大，以下的事实依然改变不了，20 世纪的大学是中世纪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的直系后裔。它们是我们(现代大学)被砍砸打磨出来的那块岩石；它们是我们(现代大学)被挖掘疏理出来的那条壕沟。现代大学和中世纪大学的基本组织是一样的，历史的延续性并

未中断。巴黎和博洛尼亚创造了现代世界的大学传统，这个共同的传统属于我们所有的高等知识机构，不管是最老的还是最新的，而且所有学院和大学的人都应该了解和珍惜这个传统。这些最早大学的起源和性质是我们接下来三个章节的主题。第一个章节将论述大学的制度，第二个章节涉及大学的教学，第三个章节论及大学学生的生活。

近年来，大学的早期历史已经引起了许多历史学家郑重其事的关注，中世纪的知识制度终于被人们从神话和传说领域里——在这里，它们长期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提升出来了。现在我们知道，牛津大学的建立并非千年庆典，可以顺理成章地归属于英王阿尔弗烈德(Alfred)的众多丰功伟绩中的一件；博洛尼亚大学的建立也不能追溯到狄奥多西(Theodosius)皇帝；巴黎大学在查理曼(Charlemagne)时期以及接下来的近四个世纪内并不存在。人们很难意识到——即使对现代人来说尚且如此——许多东西没有创建人，或者没有确切的起始日期，⁴相反“只是在成长”，缓慢地、悄无声息地产生，没有明确的记录。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经过奠基人德尼弗莱(Denifle)^[1]和黑斯廷斯·拉什达尔(Hastings Rashdall)^[2]以及当地古文物研究者的研究，最古老大学的开端仍然不甚明朗，而且常常难以断定，因此我们有时必须使自己满足于一些非常笼统的陈述。

大学产生的时期是一个知识大复兴的时期，不过它

不是这一术语通常适用的 14、15 世纪的复兴，而是更早时期的复兴，尽管鲜有人知，但从某个合适的角度来看，它与 14、15 世纪的复兴一样意义重大，历史学家现在将其称之为 12 世纪文艺复兴。只要知识一直局限于中世纪早期的“自由七艺”(the seven liberal arts)，就不会出现大学，因为除了当作学校课程之用的文法、修辞、逻辑这几个基本的文化元素和更为基本的算术、天文、几何、音乐概念之外，再没有其他知识可以传授了。无论如何，在 1100 年至 1200 年间，一股新的知识潮流以强劲的势头涌入了西欧，其中一部分经由意大利和西西里传入，不过主体部分通过西班牙的阿拉伯学者引进来，包括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欧几里得(Euclid)、托勒密(Ptolemy)和古希腊医生的著作，新的算术论著以及在黑暗时代里被掩蔽起来的罗马法教科书。除了三角形和圆的基本命题以外，欧洲业已拥有了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的论著，自此以后，它们一直被当作学校和学院的学习课程；费力的罗马数字运算被取代了——至于费力到什么程度，诸位只要通过尝试使用这些数字进行一个简单的乘法或除法运算，就很容易明白了——现在借助阿拉伯数字，人们就有可能简便快易地进行运算了；博提乌斯(Boethius)也被取而代之，“众师之师”(Master of them that know)成为欧洲逻辑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教师。至此，人们也拥有了古代法学和医学方面的全部知识。这股新的知识潮流冲破了主教座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的枷锁，创造了学者的

职业；它吸引着众多的热血青年——他们就像下一个时代里乔叟(Chaucer)笔下的牛津教士“心甘情愿求学，心甘情愿传授”——翻山越岭、越洋过海，汇集到巴黎和博洛尼亚，组成了许多学术团体，这些学术团体给了我们最早的也是最好的大学定义，教师和学生的社团。

在涉及 12 世纪的概括性叙述中，萨莱诺的医科大学是一个有所偏爱的例外。萨莱诺距离那不勒斯南部约一天的旅程，这里最先是伦巴底人的领地，后来变成诺曼人的领地，不过仍然与希腊东部来往密切，早在 11 世纪中期这里就有一所医科学学校，大致在 200 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欧洲最负盛名的医学中心。在这个“希波克拉底之城”，古希腊的医学著作一直在被阐释着，甚至在解剖学和外科手术方面有所发展，它们的教导则被压缩成精辟的保健法格言——“饭后百步走”等等——至今依然流行。对于 1231 年之前萨莱诺学校的组织情况，我们一无所知。而当那一年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插手制定标准规范它的学位时，它已经远远落后于北边的新大学了。尽管在医学史上地位重要，萨莱诺大学对大学制度的发展并未发挥多大作用。

博洛尼亚大学与南方

如果说萨莱诺大学在时间上发展较早的话，博洛尼亚大学则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萨莱诺大学仅仅是著名的医学中心，而博洛尼亚大学却是

多方面发展的机构，尽管它主要以罗马法复兴中心的身份享誉欧洲。与人们的普遍印象相反，罗马法在中世纪早期的西方并未销声匿迹，只是因为日耳曼人的入侵，它的影响大大削弱了。伴随着日耳曼法典的出现，罗马法以罗马人习惯法的形式幸存下来。（不过）不再通过伟大的《查士丁尼法典》而为世人所熟知，而是流传在许多初级的手册和格式书(form-books)里。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法变得愈加薄弱和贫瘠。《法理汇要》(Digest)——《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中最重要的部分——在603至1076年间就从世人的视野中消失了，只有两份手抄本幸存下来；用梅特兰(Maitland)的话说，它“死里逃生”。虽然法律研习持续下来了，但就是有的话，也仅仅被当作文献起草的一种训练——应用修辞学的一种形式。然后，在11世纪晚期，与贸易和城市生活的复兴紧密相连，法律的复兴出现了，这预示着下一个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次法律复兴可以追溯到意大利的很多地方，或许最先并不在博洛尼亚，但因为地理位置的优势——和现在一样，这一优势在当时就使这座城市成为意大利北部交通要道的汇合点——它(法律)旋即就在这里创建了自己的中心。1100年前的某个时间里，我们听说了一位名叫佩波(Pepo)的教师，他被誉为“博洛尼亚的辉煌灿烂之光”；至1119年，我们遇见了“学术之城博洛尼亚”(Bononia docta)这一习惯用语。在博洛尼亚，就像在巴黎，有一位伟大的教师伫立在大学发展的开端之上。这

位给予博洛尼亚声誉的教师名叫伊尔内里乌斯(Irnerius),他或许是中世纪众多伟大法学家中最负盛名的一位。至于他著述过什么教授过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不过他似乎在广泛使用完整的《民法大全》——相比较于前几个世纪里贫乏的罗马法概述而言——的基础上确立了“注解”法律教科书的方法,他完全并最终将罗马法从修辞学中分离出来,而且牢固地确立了罗马法作为专业研究学科的地位。然后,大约在1140年,圣费利斯修道院(San Felice)的修士格拉提安(Gratian),编写了《圣令集》(Decretum),这本书成为了教会法的标准教科书,并由此使教会法以高等教育的一门显要学科的身份同神学区分开来;博洛尼亚作为法律学校的卓越地位完全确立了下来。

学生阶层业已出现了,在书信和诗歌里,他们都如此表述自己。而且至1158年,意大利的学生阶层已经变得足够重要,以至于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正式授予他们权利和特权,尽管没有具体说明授予哪座城市或哪所大学的学生。至此,博洛尼亚已经变成了数百名学生的常去之地,他们不仅来自意大利,而且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外的地方。由于远离故土,又没有防卫手段,他们就联合起来寻求彼此间的保护和援助,这个外来学生或者异邦学生的组织就是大学的开端。在这个联合体中,他们似乎效仿了普遍存在于意大利的行会的例子。事实上,一般说来,大学一词最初就

意味着这类组织或社团，只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才仅限于指代教师和学生的行会(*universitas societas magistrorum discipulorumque*)。从历史上看，“大学”一词与知识的领域或知识的普遍性并无联系；它仅仅表示一个团体的全体成员，不管是理发师、木匠还是学生的团体都无关紧要。博洛尼亚的学生组成这样一所大学最初只是把它当作对抗市民的一种手段，因为随着新租户和新消费群体的不断涌现，房租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得很快，而面对着这类牟取暴利的行为，单个学生无能为力。联合起来之后，学生们就能够以集体出走的方式迫使城市就范，因为大学没有建筑物；它可以自由地迁移，历史上有许多这类迁移的例子。以较低的价格租出房屋总比无人租住要好得多，学生团体就这样通过他们的代表获得了确定寄宿费和书价的权利。

对市民的斗争取得胜利之后，学生们就转向了“他们的另一个敌人，教师”。这时学生们的威胁手段是集体罢课，因为教师最初完全依赖学生的学费生活，所以这一威胁同样奏效。教师们在契约的束缚下不得不实践着一套缜密的规则，以保证他的学生能够得到与他的学费相匹配的教育。在最早的法规(1317年)里，我们得知，教师未经许可不得无故缺席，即使只有一天的时间，如果他想离开城镇的话，他必须交纳保证金以保证他的归来。如果在常规讲座(*regular lecture*)上，他不能保证有5名听众的话，他将受到罚款的处罚，形同缺课——不能

保证有 5 名听众的课的确是一堂极其糟糕的课！他必须在铃声响起之后开始上课，下课铃响起时马上离开。未经允许，他在阐释著作时不得略过任何一章，他也不能把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推迟到一堂课的最后，他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他的教学工作，每个学年的每个特定学期都要有所进展。没有人愿意将整个学年的时间浪费在导论和书目上！像这类的“高压统治”要以学生团体的有效组织为先决条件，我们听说有两所甚至是四所这类的学生大学，每所大学都由“同乡会”(nations)组成，由一名校长(rector)负责管理。博洛尼亚大学就是一所典型的学生大学，意大利的学生现在仍然倾向于要求大学事务的发言权。当我第一次访问巴勒莫大学的时候，我发现它正在从一场学生骚乱中复原，原来学生们为了要求次数增多、综合性减少的考试而打坏了所有教室的前窗玻璃。1922 年 5 月，帕多瓦(Padua)大学 700 周年纪念日那天，学生们实际上控制了整座城镇，他们组织了独特的游行和庆典活动，喧闹和骚动异常强烈，这场隆重庄严的盛会几乎因此而中断，而且学生们的确打碎了这 11 个城市中最雄伟壮丽的一座大厦的玻璃。

被学生“大学”排斥在外的教师也组成了一个行会或“学院”，并且规定了入会的某些资格条件——以考试的方式来决定是否具备这些条件——所以未经行会的一致同意，没有学生可以加入教师行会。由于有无能力教授一门学科是对自己是否精通这门学科的一种有效测

试，所以学生们纷纷前来寻求教师许可证，把它作为自己已经达到这种能力的一个证明，而不管自己将来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这个证书——执教许可证(*licentia docendi*)——因此成为最早形式的学位。我们的高等教育学位在词语表述上仍然保留着硕士(*master*)和博士(*doctor*)的传统称谓——在起源上，这两个词语是同义的，而法国人甚至还保留着许可证(*licence*)的传统称谓。文学硕士是有资格教授“自由七艺”的学者；法学博士则是一位被证明合格的法学教师。有抱负的学生大多志在求取学位，获得学位后，他须讲授一堂就职性质的课，即使他明确否认自己意欲继续从事教师职业。至此，在博洛尼亚大学，我们不仅认识了大学的组织情况和校长之类的众所周知的高级职员，也已经认识了大学的标准学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学科，文学、医学和神学，也陆续出现了，不过博洛尼亚大学还是以罗马法学校的名声享誉欧洲。凭借这种资格，它成了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南部地区大学组织的典范，在这些地区，法律学习除了具备学术上的重要性之外，还拥有了政治上和社会上的重要意义。其中一些大学——除了附近的意大利学校，还有像蒙彼利埃和奥尔良之类的大学——变成了博洛尼亚大学的竞争对手。1224年，腓特烈二世创建了那不勒斯大学，以便于他的西西里王国的学生能够进入本国的皇帝派学校上学，而无需再进入北方的教皇派中心。博洛尼亚大学的竞争对手帕多瓦大学于1222年脱离它而

建立，直到 1922 年，在帕多瓦大学 700 周年纪念日那天，我才看到两所大学捐弃前嫌——在万名观众的欢呼声中，博洛尼亚大学校长被赐予了“和平之吻”。无论如何，帕多瓦大学在我们关注的时期内难以与博洛尼亚大学并驾齐驱，即使后来波蒂亚(Portia)从博洛尼亚大学聘请了法学权威，即使帕多瓦大学凭借伽利略(Galileo)的声望至今依然闪烁光彩。

巴黎大学与北方

至于在北欧，我们必须从巴黎圣母院(Notre-Dame)主教座堂学校寻找大学的源头。在 12 世纪之初的法国和低地国家，知识已经不再局限于修道院，附属于主教座堂的学校已经变成了异常活跃的知识中心，最负盛名的是列日(Liège)、兰斯(Rheims)、拉昂(Laon)、巴黎、奥尔良和沙特尔(Chartres)。这些学校中尤以教授“自由七艺”¹³闻名的是沙特尔，它不仅拥有圣艾夫斯(St.Ives)这样的宗教法规学者，而且拥有著名的古典文学和古典哲学教师，如伯尔纳(Bernard)和蒂埃里(Thierry)。早在 991 年，兰斯的一位修士里歇尔(Richer)就曾描述过自己长途跋涉到达沙特尔学习《希波克拉底誓言》(Aphorisms of Hippocrates of Cos)的艰辛；而自 12 世纪起，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当时北欧最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就为我们留下了有关该校教师的描述，在后面我们还有机会将他们逐一列举。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比沙特

尔更容易让我们回归于一个 12 世纪的主教座堂城市了，和过去一样，这个和平的小镇仍然被教会主宰着，仍然分享着

教长的无限宁静。

他的沉默和阴郁犹如层林中耸立出的峭壁

犹如大海缓缓退潮后留下的内陆，

……坚韧地远离

那曾经拥抱过的生命高潮，

人的喧闹声听来犹如在梦中。

当沙特尔主教座堂带着“献身于它的圣徒和国王的灵魂”完美地矗立起来的时候，它已经不是最重要的知识中心了，五十多英里开外的巴黎主教座堂学校已经让它黯然失色了，所以沙特尔从未发展成一所大学。

巴黎的优势一方面是地理原因，一方面是政治原因——它已经成为法国新君主国的首府——不过还有一部分归功于一个名为阿贝拉尔(Abelard)的著名教师的个人魅力。这位才华横溢、年轻气盛、思想激进的青年——再加上他对权威的不断质疑和些许不敬——无论在哪里教书，不管在巴黎还是在荒郊野外，都会吸引一大批学生蜂拥而至。在巴黎，他呆在蒙特-圣热讷维耶沃(Mont-Sainte-Geneviève)教堂的日子要比留在巴黎主教座堂学校的时间长得多，不过，常去巴黎已经成为他年轻时的一

个习惯，通过这种方式，他对巴黎大学的产生发挥了重大作用。从制度的层面上讲，巴黎大学是巴黎圣母院主教座堂学校的直接衍生物，该主教座堂主事(chancellor)是唯一有权在主教区颁发执教许可证的人，借此他也控制了巴黎大学的学位授予权——跟博洛尼亚大学一样，巴黎大学的学位最初只是一张教师资格证书。早期学校位于西提岛(Ile de la Cité)上的巴黎主教辖区之内，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曾经生动地描写过圣母院附近的这个错综复杂的地区，它已经被拆毁好长时间了。不久之后，我们发现教师和学生们已经开始居于连接该岛和塞纳河左岸(the Left Bank of the Seine)的小桥(Petit-Pont)上了——有一个哲学流派，the Parvipontani，就是以这座桥的名字命名——不过至13世纪，师生们已经越过了塞纳河左岸，进入了巴黎的拉丁区(the Latin Quarter)。

没人能够说清楚在什么日期，巴黎大学从主教座堂 15
学校变成了大学，尽管可以确定是在12世纪末叶之前。即便如此，大学也喜欢择定确切的日期以示纪念，巴黎大学选择了1200年，那一年它得到了第一个皇家特许状。当时市民和学生之间发生了一场冲突，一些学生被杀，国王腓力·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随后签署了一项正式的特许状，惩罚了圣母院院长(prévôt)，承认了学生及其仆从不受世俗法庭审判的权利，由此也造成了学生们在法庭面前的特殊地位——虽然免受世俗法律的制裁，但他们并未完全从世俗世界的习俗惯例中脱离出去。与

之相比更为具体的特许状是第一个教皇特许状，即 1231 年的“科学之父”(Parens scientiarum)敕令^[3]，签署于巴黎大学因为一场骚动停课两年之后。两年后，巴黎大学的一群学生发现了“喝起来纯正甜美的酒”，殴打了酒店老板和他的伙计，随后他们也轮番遭到圣母院院长及其随从的毒打，13 世纪的人们从这场冲突中清晰地目睹了罪恶之手。在敕令中确认了巴黎大学现有的豁免权之后，教皇继续规定教堂主事须慎重决定是否授予执教许可证，同时他也承认了教师和学生所享有的权利，即“制定规章条令规定讲座和辩论课的方式与时间，服饰的穿戴”，教师葬礼的参加，学士生的讲座——与训练有素的教师的讲座相比势必狭隘得多——房租以及学员的管理等。学生不得携带武器，只有那些定期出入学校的人——实际指每周至少上两次课的人——才能享受学生豁免权。

不过“大学”这个词并未出现在上述文献中，这只是人们的想当然。教师组合体意义上的大学早在 12 世纪就已存在；至 1231 年，大学已经发展成一个法人团体，例如巴黎大学，与博洛尼亚大学不同，它是一个教师大学。至此，巴黎大学已经出现了四个系科(faculties)：文学、教会法学(1219 年之后罗马法在巴黎被禁止)、医学和神学，每个系科下设一名学监(dean)。文学科教师——比其他学科的教师多很多——组成了四个“同乡会”：法国人同乡会，包括说拉丁语的人；诺曼人同乡会；皮卡第人

同乡会，包括来自低地国家的人；英国人同乡会，包括来自英格兰、德国、北欧和东欧的人。这四个同乡会负责选举大学的首脑——大学校长(the rector)，至今在欧洲大陆上，人们仍然如此称呼——不过他的任期很短，只有三个月。如果我们把幸存下来的诸如此类的记录进行判断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同乡会的许多时间都花在挥霍新成员或新职员缴纳的人会费上，或者按当时人所说的出入酒店喝光所有余款——小桥附近的双剑酒馆、圣雅克街上挂有“圣母玛利亚”招牌的酒馆、天鹅酒馆、猎鹰酒馆、“法国的拥抱”酒馆，以及其他数十个类似的地方。一本关于中世纪巴黎酒馆的学术专著仅仅依据英国人同乡会的记录就写成了。大学同乡会的人为组成似乎鼓励而非减弱了呈现于巴黎的不同地区之间的宿怨和敌对，对此，维特里的雅克(Jacques de Vitry)为我们留下了颇为经典的描述：[4]

他们不仅仅针对各种宗派或者一些论题争论不休、相持不下；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也会引起他们之间的不和、敌意和仇恨，他们无礼地说着各种冒犯和侮辱人格的话攻击对方。他们断言英国人都是酒鬼，而且拖着辫子；法国的子孙骄傲、柔弱，而且像个娘们似地精心打扮自己。他们说德国人庆祝自己的节日时，喧闹、污秽；诺曼人虚荣、自负；普图瓦人(Poitevins)背信弃义，而且都是投机分子。他们认为勃艮第人粗

俗、愚蠢。布列塔尼人一般被认为轻浮、善变，而且他们常常被谴责与亚瑟(Arthur)的死有关系。伦巴底人则被认为贪婪、堕落，而且怯懦；罗马人爱煽风点火、制造骚乱、造谣中伤；西西里人暴虐、残忍；布拉班特(Brabant)的居民虽出身高贵，但都是纵火犯、强盗和强奸犯；弗兰德斯人多变、奢侈、贪心，像黄油一样屈从于人，而且懒惰。一番这样的凌辱之后，唇枪舌战往往转变成打架斗殴。

另一项可以追溯到 12 世纪的巴黎大学的大学制度是学院。在许多大学里，学院很早就成为学校生活的固定单位，不过最初学院仅仅是一个捐赠性质的慈善机构或居所。“最早创建学院的人目的仅在于为那些无力支付生活费的穷学生提供食宿保障”；^[5]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学院逐渐变成了学校生活和教学的正规中心，将大学的许多活动都吸收进了学院当中。即使大学没有的话，学院也有建筑物和捐赠基金。巴黎大学最早的学院建立于 1180 年；至 1500 年，总计有 68 所学院，巴黎大学的学院制度一直保留到法国大革命，之后便只剩下了残垣断壁，或者是像索邦(Sorbonne)之类的地名——13 世纪圣路易(St. Louis)神父为神学家们创建的索邦神学院(Collège de la Sorbonne)的唯一纪念物。欧洲大陆的其他许多大学也有自己的学院，其中一所学院——博洛尼亚大学古老的西班牙学院——至今还保留着，一些西班牙年轻

人常常进入悠然安静的院子里尽情取乐。当然学院最终安家落户的地方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那里，它们逐渐变成大学生活中最具特色的特征，除了管理学生生活之外，它实际上还霸占了所有的教学，直至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变成了一个考试和学位授予机构。在这里，最早的学院有巴利奥学院、默顿学院、彼得豪斯学院，在时间上可追溯到 13 世纪。

巴黎大学在中世纪以神学学校的身份享誉欧洲，神学是中世纪研习的最高学科，人们称它为“高深科学的夫人” (*madame la haute science*)，这意味着巴黎大学地位卓著。“意大利人有教皇，德国人有帝国，法国人有知识”，一句古老的谚语如是说；而知识选择的居所是巴黎。因而巴黎大学自然而然地成为北欧大学的源头和典范。牛津大学在 12 世纪末从巴黎大学的母体中发展出来，同样没有确切的日期；一段时间之后，剑桥大学方出现。德国的大学——没有一所早于 14 世纪——也承认效 20 仿巴黎大学。所以选帝侯 (*Elector Palatine*) 鲁普雷希特 (*Ruprecht*) 在 1386 年创建海德堡大学时——后来的这些大学都在具体的时间里建立起来——规定，它“将依据巴黎大学已经约定成俗的方式和惯例进行统治、布置和管理，作为巴黎大学的侍女——我们期待它名副其实——它将尽可能在各个方面效仿巴黎大学的样子，所以它也将拥有四个系科”，四个同乡会，一名校长，学生及其仆从享有豁免权，甚至这几个系科的方形帽和长袍也“是巴

黎大学一直遵循的样式”。^[6]

至中世纪后期，欧洲各地至少有 80 所大学已经建立起来。^[7]其中一些大学昙花一现，许多也只是在地方上显示出重要性来，还有一些如萨莱诺大学则由繁荣走向了衰落，不过巴黎大学和蒙彼利埃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和帕多瓦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维也纳大学、布拉格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科英布拉(Coimbra)大学和萨拉曼卡大学，克拉科夫大学和鲁汶(Louvain)大学，许多世纪以来一直保持着卓越的地位。建立时间更为靠后的欧洲其他优秀大学如柏林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爱丁堡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大学在组织上也遵循古代大学的传统模式。美国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同时代英格兰大学学院的翻版，因为在当时，英格兰的大学已经被它的学院遮蔽了光彩；不过在 19 世纪晚期的大学创建过程中，美国转而效仿欧洲大陆的大学，从而再一次进入了古代传统。甚至在殖民地时期，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大学传统还保留着，如 1764 年，罗得岛学院(Rhode Island College)的特许状授予该学院“美国的学院和欧洲的大学所享有的特权、尊严和豁免权”。

中世纪的遗产

那么我们从最古老的大学中到底继承了什么呢？首先不是建筑物或者某种建筑式样，因为早期的大学并没有自己的建筑物，而只是偶尔使用私人的厅堂和附近的

教堂。毕竟，晚至 1775 年，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第一个浸礼派教堂的建立还是“为了公众在这里崇拜万能的上帝，为了大学在这里举办毕业典礼”！的确，如果有人想重现古代大学生活的话，这些大学现在的遗留物对他而言几乎没有多大价值。萨莱诺大学没有留下任何纪念性建筑物，尽管它有一座古老珍贵的教堂——希尔德布兰(Hildebrand)长眠于此，他肯定目睹了许多代学生穿梭于此追求医生职业。从“多拱顶的帕多瓦大学所引以为荣”的厅堂和盾形徽章中，我们看到的是文艺复兴而非中世纪的传统。即使是带有斜塔和冷色调连拱廊的博洛尼亚大学(学术之城博洛尼亚)也没有留下早于 14 世纪的大学建筑物，该大学的法学教师们自 14 世纪以后收集的最古老的纪念品现在都进入了市立博物馆。蒙彼利埃大学和奥尔良大学没有留下 14 世纪时期建立的任何东西。巴黎大学经常过于忽视它在历史上颇有名气的过去，如今它只能向我们展示古代的圣朱利恩-勒-波弗莱(Saint Julien-le-Pauvre)教堂了——大学会议经常在这里举行——除非我们相信，就像我们应该相信的那样，它就是西提岛上发展出巴黎大学的那所大教堂。剑桥大学建立时间最早的彼得豪斯学院只留下了早期建筑物的残垣断壁；保存最完好的国王学院附属礼拜堂则是 15 世纪的遗物。与其他所有大学相比，牛津大学给世人留下了延续传统的最深刻印象，在马修·阿诺尔德(Matthew Arnold)眼中，牛津大学“如此可敬，又如此可爱……她满怀深情地横

卧在那里，她的花园在月光中无限伸展着，她的高塔喃喃低语着中世纪时代的最后一丝魅力”；但是就现时的学院建筑而言，它们拥有更多的是世人的中世纪情结而非中世纪的东西。只是在默顿学院——它确定了牛津大学学院的模型——现存的建筑物才把我们带回到了 1300 年，此外这里再也没有什么地方属于 14 世纪了。牛津大学令人肃然起敬的荣耀包括博德利图书馆、玛格达赖恩塔、基督教学堂则属于更靠后的都铎时期，按照通常的算法应该属于近代。当我们说多么中世纪的啊，我们往往是在说多么都铎的啊！

大学传统的延续性也不在于学位礼节和仪式，尽管偶尔有所保留，如以指环或和平之吻的方式授予学位，或者依据沙漏(the hour glass)决定考试时间——我曾经在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大学见过。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科英布拉大学里，学生们日常穿着的学位服也带有一些传统因素，不过在美国，这一传统早已被我们的先人中断了，如今流行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正式方形帽和长袍是现代奥尔巴尼(Albany)大学的作品而非中世纪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的作品。即使在大学的古老家园，学位服也发生了变化，拉什达尔说：“现在的牛津大学可能没有一件学位服与中世纪学位服非常相像。”^[8]来自中世纪帕多瓦大学的学生肯定辨认不出去年夏天在学校大路上奏响号角的斑驳陆离的游行队伍了；索邦的罗伯特如果在 1918 年看到穿着非中世纪风格的华丽长袍，聚集在索邦

大厅看台上观看威尔逊(Wilson)总统接受荣誉学位的全体师生的话，肯定会擦亮自己的眼睛。

制度才是大学传统最直接的表现。首先是大学之名，即教师和学生组成的社团，他们过着共同的知识生活。这类团体是中世纪的典型特色，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现代世界找不出任何东西来取代它。其次是学习课程概念，明确制定学习的时间和科目，借助考试测验成绩，然后方可获得一个学位，当然许多学位本身——文学、法学、医学和神学的学士学位(获得硕士学位的一个平台)、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就是学习课程概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后是系科，四个或更多，每个都设有学监，还有主事和校长之类的高级职员，更不用说学院了，无论哪里都保留着这种居所性质的学院。大学组织的这些要素清楚明了，而且持续不断地延续下来了。它们已经延续七百多年了——什么样的政府能够维持如此长久的时间呢？很可能所有这些因素(对大学发展而言)都不是决定性的——在这个变化多端的世界里什么东西都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唯独它们坚韧持久，适于被应用，也适于被滥用，如布赖斯的大学(Bryce's University)有一个仅由“约翰逊夫人和她自己组成的”系科，而(美国)中西部的“11所主要大学”则同属于一种形态！世人时而批评大学超然冷漠，时而批评它一味追求职业教育，时而批评它过于安乐，时而批评它过于严肃，他们处心积虑地改造大学，或者取消入学资格，或者去除所有不能直接把

学生们引向面包和黄油的制度；但是对大学而言，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它的主要职责——培养学者，保持学习和调研的传统。拉什达尔说，中世纪大学的荣耀是“知识的献祭”^[9]，这份荣耀和幻想至今尚未从世上消失。有人说，“中世纪大学是孕育现代精神的学校”。早期的大学如何完成这一任务？这个问题是我们下一章的主题。

注释：

[1] H.Denifle, *Die Entstehung der Universitäten des Mittelalters bis 1400*, vol. I (Berlin, 1880).

[2] H.Rashdall,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2 vols. in 3 (Oxford, 1895); rev. ed., 3 vols.(Oxford, 1936).后面出自这本书的引文皆参考 1936 年的版本。

[3] Trans. by L.Thorndike, *University Records and Life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1944), pp.35—39.

[4] As translated by D.C.Munro, *The Mediaeval Student*(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ranslations and Reprints, Philadelphia, 1899), p.19f.

[5] Rashdall, *op. cit.*, I, 500.

[6] Translated in E.F.Henderson, *Select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Middle Ages*(London and New York, 1892), pp.262—266.

[7] 参阅 Rashdall, *op. cit.*, I, XXIV 中的表格以及 Vol. II 开头的地图，另参阅 Shepherd, *Historical Atlas*(New York, 1911), p.100。

[8] *Op. cit.*, III, 391f.

[9] *Op. cit.*, III, 442.

第二章

中世纪的教师

学习与教科书

27

在上一章中，我们把中世纪大学看作一项制度，现在我们开始把它视为一个知识中心。这就需要对大学的学习课程、教学方式、大学教师的地位与自由问题进行一番描述了。在大学制度方面表现得如此鲜明的历史延续性在大学知识内容方面往往不甚明显。不过即便如此，贯穿历史的主线并未中断，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对比经常不是人们所推测的那样尖锐。

如前所述，中世纪早期教育的基础是所谓的“自由七艺”，其中文法、修辞、逻辑三门学科组成“三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四门学科组成“四艺”。相比较而言，前者更初级一些，不过后者也足够初级的了。 28
在古典知识的衰落时期，“自由七艺”完成了学科数目的

确定和内容的标准化，完整的“自由七艺”概念主要是通过一个名为马提亚努斯·卡佩拉(Martianus Capella)的人的一本著作——写于 5 世纪早期——传入中世纪的。古典时代后期在压缩和简化知识以适应它们自身相对的智力局限的同时，潜意识里也为下一个时代准备好了小巧便利的知识包裹，仅此一个包裹就可以被当作一个旅行用品携带着走过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的风风雨雨。古代世界的知识几乎全被几本标准教科书公式化了，并以此方式传入了中世纪时代。这些手册权威性极高，以至于在任何时期里，它们的使用一览表都可以被视为反映该时期知识程度和教育性质的一个精确指数。这是一个书本至上的时代——得到大家公认的权威性典籍受到极大推崇——它的教育完全是照本宣科式的。

在中世纪早期的修道院学校和主教座堂学校里，教科书少且简单，主要包括多那图斯(Donatus)和普里西安(Priscian)编写的附有一些初级读本的拉丁文法书，博提乌斯编写的算术和音乐手册，还有他的一些逻辑学手册，一本修辞学指南，以及最初级的几何原理手册，另外还有可敬的比德(Venerable Bede)编写的应用天文学大纲，至于希腊文著作，自然是一本也没有。这份薄弱的文学课程因为 12 世纪文艺复兴而大大扩展了，这场文艺复兴为西方的知识宝库中增添了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欧几里得的全部著作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与此同时，文法标题下的拉丁古典文学作品得到了人们的积极

研习和阅读。古典知识的复兴——虽然值得注意但相对而言却鲜有人知——集中在诸如沙特尔和奥尔良之类的主教座堂学校里，在这里，人们热情高涨地研读古典作家，并创造出了水平相当高的拉丁诗文，真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精神由此展现出来。其中一位诗人，勒芒山的伊尔德贝主教(Bishop Hildebert of Le Mans)的某些作品竟然被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误认为“真古董”(real antiques)。然而，尽管成绩斐然，这场古典主义运动却是昙花一现，由于逻辑学的独占鳌头和更加实用的法律和修辞学研习，这场运动很早就夭折了。12世纪晚期，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就痛斥同时代的逻辑学家文学知识肤浅；至13世纪，大学课程里的文学作品研习已经消失殆尽。接近于1250年的时候，当一位法国诗人，亨利·当德利(Henri d'Andeli)创作《自由七艺之战》(Battle of the Seven Arts)时，古典作家们早已是古人了，所以他与同时代的人进行了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

逻辑课，学生们趋之若鹜，

文法课，学生们渐渐丢弃。

.....

光彩照人的罗马法

高高在上的教会法

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

如果说古典文学作品和方言文学作品的缺乏是大学文学课程的一个显著特色的话，逻辑学或辩证法受重视的程度则是另一个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特色。最早的大学课程法令，巴黎大学 1215 年的课程法令，就要求学习亚里士多德的全部逻辑学著作，在整个中世纪时代，这些作品一直是文学课的支柱，所以乔叟可以说，研习逻辑学等同于上大学——

逻辑学研习要进行很长时间。

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个类比极其恰当，因为逻辑学不仅自身是大学的一门主要学科，而且还被视为一种学习方法，从而渗透到其他各门学科当中，它赋予了中世纪头脑特有的腔调和品质。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辩论、支持或者反对某一特定命题的论据的有序排列，这些变成了那个时代哲学和神学也包括法学和医学知识的研习习惯。逻辑学当然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不过这位哲学家的其他作品也很快跟上来了，所以在 1254 年的巴黎大学课程里我们发现了他的《伦理学》(Ethics)、《形而上学》(Metaphysics)以及早先禁止学生阅读的各种自然科学专著。但丁认为，凭借着其方法的普遍性——丝毫不亚于其包罗万象的知识——亚里士多德已经变成了“众师之师”(the Master of them that known)。作为“书本知识之父和评论家的鼻祖”，没有一位作家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

牢固地促使中世纪学人产生敬畏教科书的思想，并且促使他们养成拘泥于形式思考的习惯。诸如来世等看起来危及信仰的学说都被人们巧辩过去，人们还运用这位异教哲学家的方法创建了伟大的神学权威体系。当每样东西都依赖论证时，文学形式的观念也就随之消失了。

如果说古典文学作品的研习仅仅局限于例句和节录以阐明文法规则的话，修辞学则因为自己的实用性而呈现出略微不同的命运来。中世纪知识生活并不以文学表达的自然流畅或广泛普及为特色。没有多少人会写字，更没有多少人会写信，专职抄写员(scribes)和公证人(notaries)——中世纪的通信业务大部分都由他们来完成——用传统修辞学已成陈规的形式主义牢牢控制了这一时期的书信写作。起草信函和官方文件的正规教育在 32 学校和大法院(chanceries)里进行，为数众多的教师，当时称为口述者(dictators)，则游走各地，讲授这门颇有价值的技艺——“对于教士、称职的修士、受人尊敬的世俗者而言往往必需而且非常必要的一项技艺”，一位修辞学家如是告诉我们。至 13 世纪，这类教师已经在某些大学里占据了一席之地，特别是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大学里，他们以能够与现代商业课程的宣扬相媲美的方式宣传他们的看家本领——时间短而见效快，不浪费时间浪费在过时的古典作家身上，所有东西都新鲜、生动且紧跟时代步伐，如果需要的话，当天学当天用！所以博洛尼亚大学的一位教师嘲笑人们研习西塞罗(Cicero)，他不记得自己曾经拜读

过他的作品，他许诺要教会学生写作各式各样的信函和官方文件，这是那个时代对公证人和秘书(secretaries)的要求。自此以后，我们在下文中将看到，这些教师专攻学生书信写作，主要是教会学生如何有技巧地写信以吸引父母的钱包，它们的实用性显而易见。一位书信写作人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巴黎一位贫苦、勤奋的学生如何写信向母亲索要必要的花销。”这难道还不能保证在场的每一位听众至少能够从中听出“真正的东西”吗？修辞学教师也有可能被召集起来起草大学的计划书，1229年，新成立的图卢兹(Toulouse)大学的修辞学教师发布了一项类似于广告宣传的通知，该通知陈述了新图卢兹大学在下列诸多方面对巴黎大学的优越性——既在布道坛授课，也在街道拐角处布道的神学家，推崇查士丁尼(Justinian)的法学家，推崇盖伦(Galen)的医学家，精通文法和逻辑学的教师，携带管风琴的乐师，被巴黎大学所禁止的自然哲学讲座，低廉的物价，友好的人们，根除了异端荆棘的坦途，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田园，管理葡萄园的巴克斯(Bacchus)，在田野里沐浴着和煦阳光的克瑞斯(Ceres)*——这一直是古代哲学家们所渴望的景象——他们对所有的教师和学生绝对地宽容。谁抗拒得了来自南方的这份充满诱惑的呼吁呢？

随着文法和修辞学降至次要地位，“四艺”学科受到

* Bacchus，罗马神话中的酒神。 Ceres，罗马神话中的谷神。——译者注

吝啬关注，文学课主要变成了讲授逻辑学和哲学的课程，另外还讲授许多通过运用经院哲学方法研习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之书”(natural books)而可以理解的自然科学著作。大学实验室在中世纪时代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历史和社会科学甚至在更晚的时期才在大学里有所耳闻。刻苦、认真地钻研几本被人们反复阅读的著作是中世纪学习的准则。正常修完六年的文学课后，即可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在此期间，在有的大学里，可以先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文学科毕业是进行专业研究的共同前提，它对于神学研习而言，通常是必需的，有志于成为律师或医生的学生有时也要先获得文学学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可惜美国给予它的关注太少了！³⁴

与人们的普遍印象相反，在中世纪大学里，神学系学生相对较少，因为牧师接受神学教育的硬性规定随着反宗教改革的发生才出现。神学系的入学条件很苛刻；神学课程学习时间很长；神学课本价格昂贵。确实，这些课本通常只是《圣经》和彼得·隆巴德(Peter Lombard)的《箴言集》(Sentences)，但是在中世纪时代，《圣经》累计起来可能多达7卷，尤其是当它带有许多注解和评论的时候，而且手工抄写这么多卷书是一件枯燥无味、代价高昂的苦差事。奥尔良大学一位有志向的学生向父亲要钱购买《圣经》，开始神学学习，父亲却劝告他改学某个合算的职业。巴黎大学校长抱怨说，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学生们也是在很晚之后才学习神学，而这本应

该是他们年轻时的伴侣。

医学研习同样是著作研习，主要是盖伦和希波克拉底及其阿拉伯翻译家和评注家的著作，在这些阿拉伯学者中，阿维森那(Avicenna)是 13 世纪之后首屈一指的人物。当然阿维森那在东方的影响更为牢固，因为晚至 1887 年，波斯首都当地的绝大多数医生“还只知阿维森那的医学知识”。^[1]除了南方某些学校如博洛尼亚大学和蒙彼利埃大学在解剖学和外科学方面取得一些进步以外，中世纪大学对于医学知识并没有作出多大贡献，因为当时的人忙于改编每一门学科，使其尽可能适应当时盛行的教条式的词语表述和逻辑推理规程。

所有法学教育的基础照例是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因为中世纪欧洲的习惯法从未成为大学教育的一门学科，核心教材是《法理汇要》，它概括总结了罗马法学最为成熟的成果，正是因为精通了《法理汇要》，中世纪的法学家们才在历史上享有盛誉。他们把与《民法大全》有关的资料都以详尽注解的方式密密麻麻地堆积在每个段落里。他们的法学思想所展示出来的凝练和精妙可以与经院哲学家的思想相提并论。毕竟，“法学是经院哲学的一种形式”。不过尽管经院哲学方法在现代世界的许多领域里已经丧失了地位，注解者的工作却仍然保留了下来。拉什达尔说：“在许多方面，博洛尼亚大学的成果代表着中世纪欧洲知识界最辉煌的成就。事实上，在中世纪人们对于研习和发展业已存在的法律体系

有某种天然的爱好的。虽然他们缺乏历史知识和对物质世界的了解，但是从显而易见的程度上讲，这并不碍于人们去掌握一门仅仅关注交易和日常生活关系的科学。法学家们把查士丁尼奉为权威，就像神学家们推崇宗教法规学者和早期教父的著作，哲学家们尊崇亚里士多德，不过法学家们有优于他们的地方，即可获得第一手的罗马法著作。罗马法只需被理解、被阐释、被发展、被运用……这些人的作品或许是中世纪知识的唯一成果，现代社会无论哪门学科的教师都有可能查询它们，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历史兴趣，也不仅仅是希望从中发现有启发性的思想，而且是为了有机会找到依然困扰现代学生的疑惑、争议和问题的解决办法。”^[2]

教会法和罗马法关系密切，事实上，出于多方面的目的，同时获得这两门学科的学位如法学博士(Doctor utriusque juris)——如同我们所说的 J.U.D.学位或 LL.D.学位——是非常有利的。神学家们谴责教会法是一门“营利”学科，导致学生放弃了对纯粹知识的追求，转而谋求教界高职。至 13 世纪，中世纪教会俨然是一个庞大的管理机器，需要法学家们来开动它，所以一个训练有素的宗教法规学者就有机会爬升到最高教职。^[3]难怪教会法吸引了许多有识之士、富家子弟，甚至是不务正业之徒，因为我们听说，在巴黎大学，懒惰的学生常常在晌午的时候去听宗教法学者的讲座，而不去听早晨六点就开始的其他讲座。教会法的标准教科书是格拉提安的《圣令

集》，补充以历任教皇的教令集(decretals)，尤其是 1234 年格雷戈里九世(Gregory IX)分发给各主要大学的教令大全(the great collection)。这些教科书的研习方法与罗马法的研习方法如出一辙，这种研习方法导致中世纪后期产生了丰富的宗教法规作品，注解这些教科书的作品也因此而出现，但丁认为，正是因为专注于注解，“福音书和早期基督教神学家(the great doctors)的作品被抛弃了”。

所有这些学科所需要的教科书都由大学自身负责供给以确保它们的足额、准确和廉价，因为管理图书贸易是大学最早、最有价值的一项特权。由于图书价格昂贵，人们通常只是租借——每张四开的纸(quire)有一个固定的价格——而非拥有它；实际上，图书的销售受到严格限制，以防止价格垄断，并阻止它们流出本市。巴黎大学最早的一份图书价目表(约 1286 年)罗列了 138 种手抄本图书的出租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学生开始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书——一本《圣经》，或者至少是《圣经》的某一部分，《法理汇要》的片断，甚或乔叟笔下的牛津教士所拥有的“20 本黑色或红色封皮装订的书”。不管是租借还是拥有，图书的供给量并非微不足道；在博洛尼亚大学的纪念画中，每名学生面前都摆有一本书。只要每本图书的副本都得靠手抄完成，准确性就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所以大学都有自己的监督员和校对员，他们定期检查市场上销售的各类图书。此外，在博洛尼亚大学，新书的持续供应也得到了保证，该校要求每位

教师都要把其复述课和辩论课讲义的副本交给出版商以备出版。法学和神学的主要著作都是大学讲座的自然产物。由于供求如此大量地集中于大学，大学成为图书贸易和出版业(我们可以这么说)的主要中心也就不足为奇了。只要学生们能够租借到他们所需要的图书，图书馆就不像我们最初猜想的那样必需，大学自身长时间没有图书馆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³⁹图书开始被捐赠给学生们使用，主要是采取遗赠给学院的方式，在那里它们可以被现场借阅或查阅。1338年，巴黎第一大图书馆索邦图书馆的一份图书目录(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上列有1722卷书，其中许多书在法国图书馆仍可看到，牛津大学的许多学院仍然保留着中世纪图书馆馆藏的手抄本图书。

教学与考试

从书本转向教师，我们从一开始就得指出，中世纪产生了许多杰出且有声望的教师。那时知识结构相对简单，内容还远未包罗万象，所以尽管要严格遵从教科书，教育者的个性发展空间仍然很大。因此，在大学产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阿尔克温(Alcuin)一直是查理曼宫廷教育和图尔(Tours)修道院学校教育复兴中令人欢欣鼓舞的人物，两个世纪之后，兰斯的热尔贝(Gerbert)又激起了同时代人的惊叹，他在修辞学研习中娴熟地使用古典文学作品，他的天文学教学方法如此别出心裁，以至于

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被视为“神赐的”。^[4]从大学的起源时期起，作为一名教师和“课堂表演者”的阿贝拉尔就给我们留下了相当清晰的印象：勇敢、见解独到、头脑清晰、酷爱争论，总是精神饱满、振奋人心，而且还“能使严肃的人忍俊不禁”。他的辩论步骤——展现在他的著作《是与否》(Sic et non)中——是列举权威和论据支持或反对特定命题，这一方法很快就在格拉提安的《歧义教规之协调》(Concord of Discordant Canons)中得到了效仿，而且被亚里士多德的《新逻辑》(New Logic)所强化，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的经院哲学方法将它发挥到极致，它在许多代人的思想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尽管阿贝拉尔和他的后继者使用这一方法是为了磨练才智，但是当他把它公式化时，是或不是之间的绝对对立却没有为中间立场和思想的细微差异(nuances)——里南(Renan)提醒说，真理通常在这里找到——留下空间。

至于同时代人对12世纪教师的印象，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对自己于1136—1147年在法国主要是巴黎和沙特尔的游学经历(Wanderjabre)进行的一番描述是最经典的，它一直被人们反复引用。^[5]他先跟随阿贝拉尔学习了辩证法的入门知识，后又跟随另外两名教师继续学习这门技艺，在他们两人中，一位一丝不苟、简明扼要、一语中的，另一位思维敏捷、视野开阔，不会对问题作简单的答复。“后来，其中一位教师去了博洛尼亚，摒弃了他以前所讲授的东西，所以回来之后，也就不再授课了。”然

后，约翰就转向了沙特尔，跟随孔什的威廉(William of Conches)和伯尔纳学习文法。在这里，文学作品的讲授既文雅又透彻，约翰对此赞美不已——严谨细致的作品研习、精选摘录的记诵、写作方式的文法讲授、优秀范文的模仿、虚构华丽的无情揭露，还有伯尔纳本人的才能，凭借这些才能，他已经成为“现代高卢(Gaul)最丰富的知识源泉”。离开12年后重返巴黎，约翰发现他旧时的同伴

“依然如故，而且故步自封；他们看来既没有达到解决旧问题的目的，也没有增添一丁点儿新主张。曾经激励他们的目标现在依然奏效；他们只在一个方面取得了进步：抛弃了温和，不懂得谦虚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的苏醒，人们或许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因而经验告诉我一个明白无误的结论，即辩证法推动其他学科的发展，所以如果它独自存在的话，它将毫无生气、一无所获，它也不会加快大脑创造出哲学的成果，除非从别的地方孕育”。

13世纪的教师中谈论自己最多的是文法和修辞学教师，如博洛尼亚大学的邦孔帕涅(Buoncompagno)，巴黎大学的加兰的约翰(John of Garlande)，奥尔良大学的普罗旺斯的庞塞(Ponce of Provence)，那不勒斯大学的阿奎莱亚的洛伦佐(Lorenzo of Aquileia)，几乎任何地方的文法和修辞学教师皆如此，不过我们将在其他与之有关联的部分来了解他们言过其实的作品，与之相比较意义更重大的是博洛尼亚大学的奥德弗雷德斯(Odofredus)针对其《旧法

理汇要》(Old Digest)讲座的一番陈述：

3 关于教学方法，以下的通则一直被古代和现代的法学博士尤其是我自己的老师所遵循，我也将遵循这一方法；首先，在讲解原文之前，我将概述每一个标题；其二，我将尽我所能清楚、明确地讲述每一项法律(包含在标题里面)的含义；其三，我将以校正为目的通读一遍课文；其四，我将简短地重复每一项法律的内容；其五，我将竭尽上帝所赋予我的能力解释一些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之说，附带补充法律的一般原理(从段落中提炼)——统称为“简短法规”(Brocardica)——并解释法律解答中出现的差异或一些精妙而有用的问题。如果有的法律看起来值得重复的话——或者因为它的名声，或者因为人们对它的争论——我将留它作为晚上的重复课，我每学年至少安排两次辩论课，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一次安排在圣诞节前夕，一次安排在复活节前夕。

我的《旧法理汇要》讲座总是安排在米迦勒节后第八天(10月6日)或前后的时间里，借助上帝的帮助，全部——包括常规讲座和非常规讲座——完成于8月中旬左右。我的《法典》(Code)讲座安排在米加勒节后两周左右开始，借助上帝的帮助，全部——包括常规讲座和非常规讲座——完成于8月1日。此前，这里的法学博士并不讲授非常规讲座；但是跟随我上课

的所有学生都会有所收获,即使是对法律一无所知的学生和新来的学生,因为他们将听到整本书的讲解,任何内容都不会像这里一度流行的那样被省略掉。对法律一无所知的学生可以从案例的陈述和课本的讲解中获益,水平较高的学生将更加擅长于提出精妙的问题和反驳别人的意见。我还将阅读所有的评注,而我们的上一代人并不这样做。

随后是关于选择教师和学习方法的一般性建议,然后是对《法理汇要》的一番总体评价。

这门课程结束时是这样的:

先生们,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始有终地从头到尾学完 44
了这本书,班上的每一个人都清楚这一点,为此,我们应该感谢上帝和圣母以及所有圣徒们。在这座城市里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即,每当学完一本书时,人们就要对着圣灵们做弥撒,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应该被遵守。不过既然按照惯例,法学博士在讲解完一本书时要谈谈自己的下一步计划,所以我也先谈一下,但不会太多。下一年,我希望自己一如既往地尽职尽责、合乎法规地讲授常规讲座,但不再讲授非常规课了,因为学生不是诚实的付款人,希望学到知识,但不愿意付钱,正如一句谚语所说:所有人都想知道,但没有人愿意付出代价。我没有太多需要向你们说的了,

除了以上帝赐福的名义解散你们，并乞求你们做弥撒。^[6]

尽管在书本少且没有实验室的时期，正式讲座十分重要，但它决不是教育的唯一手段。要想全面考察大学教学的话，就必须注意到以下教学手段：不太正式的“粗略讲座”(cursory)或“非常规讲座”(extraordinary)，许多仅仅由学士生讲授；复习课和“重复课”，常常晚上在教会办的旅客招待所(hospices)或学院里进行；还有辩论课，为最后的劫难即公开辩护毕业论文做准备。

进行这些讲座的教室已经消失很久了。在当时如果自己的居所没有合适房间的话，教师就会在邻近地区租用一个讲堂。在巴黎大学，这样的讲堂几乎都集中在左岸的一条街上，但丁称其为稻草街(Vicus Stramineus)或福阿尔街(Rue du Fouarre)，显然是根据干草铺就的路面——学生们上课时坐在上面记笔记——来称呼的。博洛尼亚大学的教室则颇为炫耀，邦孔帕涅在1235年曾经描写过这样一个理想的讲堂，安静、整洁，透过窗户可以看到赏心悦目的景色，墙壁被粉刷成绿色，但上面没有让人分心的画像或塑像，教师的座位被抬高了，便于他看到所有人，也便于他被所有人看到，学生的座位固定不变地依据同乡会 and 个人的地位与声望分配；不过他意味深长地补充说：“我过去从未有过这样的一个讲堂，所以我不相信曾经建立过这样的讲堂。”我们对博洛尼亚大学教

室实际情况的了解主要来自于 14、15 世纪教师的纪念画和缩微画像。其中教师通常坐在位于高台之上、天篷之下的一张桌子前，学生们则坐在平行或倾斜的桌子前，⁴⁶ 他们的书本展开在桌子上。医学教师和法学教师一样，通常会在自己面前摆着一卷展开的书。

结业考试的本质在巴黎大学得到了最好的阐释，索邦学院的创建人，和蔼可亲的说教家索邦的罗伯特在《论良心》(De conscientia)一书中运用与末日审判相比较的办法对此进行了一番描述。在把约伯(圣经中的人物)希望他的“对手著有一本书”(adversary had written a book)的愿望作为题目，并按照那个时代所认可的方式概述完标题之后，罗伯特开始了这样的描述，如果有人决定追求巴黎大学的法学执教许可证且不能被免除考试的话——许多大人物经过特别允许可以免试——他总是非常希望校长或他所信任的某个人告诉他考哪本书。但是找出这本书之后，他又会忽略它而去研习其他书，就像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疯子，不过即便如此疯狂，他也已经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良心都将无一例外地受到检验。此外，如果有人被校长否决的话，下一年他可以再考一次，或者通过朋友说情或向校长亲属或其他考试官送礼或提供服务的话，校长还有可能接受劝诱改变主意。但是末日审判的判决将是不可变更的，财富或权势，或者坚定地宣称自己是一名杰出的宗教法规学者或罗马法学者，或者宣称自己对所有⁴⁷

论据和推理谬误了如指掌，这些皆于事无补。然后，如果有人在校长面前通不过考试的话，这件事情也仅有五六个人知道，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份耻辱也就不了了之。但是伟大的校长(上帝)将当着全世界人的面拒绝罪人“进入完美大学”。校长也不会鞭打学位投考者，但是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有罪之人将会受到来自约沙法大峡谷(Jehosaphat)且穿越地狱的一根铁棒的鞭打，我们也不能期望像文法学校里不务正业的学生那样凭借装病、逃学或比老师强壮的手段逃脱安息日(Saturday)的惩罚，我们也不能像他们那样凭借“毕竟我们的欢乐已经值得一顿鞭答”的思想自我安慰。校长的考试也是自愿参加的；他不会强迫任何人追求学位，只要学生愿意，他就一直搁置着，甚至烦恼于学生持续不断的考试要求。在学习良心之书的时候，我们应该效仿执教许可证的投考者，他们有节制地吃喝，固定不变地研究备考之书，只听这门学科的讲座，所以他们难以向同伴隐瞒他们正在为考试做准备的事实。如此准备考试并不是5天或10天就能完成的工作——尽管许多人不愿拿出1天或1小时的时间来沉思他们的罪孽——而是许多年的功夫。在考试的时候，校长会问：“兄弟，你怎么理解这个问题，你怎么理解这个和这个？”校长不满意于不知究竟的字面了解，但是他仅要求理解一本书中的七八个章节，而且学位投考者只需要回答出四个问题中的三个就可以通过考试，而伟大的审判官(指上帝)会从头到尾倾听我们陈述自己的

良心之书，不容许出现任何差错。 还有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校长并非总是亲自主持考试，所以本来在如此博学之人面前战战兢兢的学生在代行校长之职的教师面前就会回答得很好。 罗伯特在书中没有提及任何有关当众答辩毕业论文(the maintenance of a thesis against all comers)的情况，这是一个重要的结业练习，在德国的大学里，它仍然被当作一种仪式保留着。

在博洛尼亚大学，首先博士们面临着一场“严格而恐怖的考试”，他们每个人都要宣誓“以对待自己儿子的方式”对待学位投考人。 随后才是公开考试和学位获得，一封写给学生家长的信对此作了这样一番描述：

“‘对着上帝欢唱新歌吧，用弦乐器和管风琴奏乐赞美他 49 吧，用高调的钹欢庆吧’，因为你的儿子举行了一场令人称颂的辩论会，众多教师和学生参加了这场辩论会。 他准确无误地回答出了所有问题；没有人能够战胜他的观点。 他还举办了一场丰盛的宴会，在宴会上，富人和穷人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他已经开始正式授课了，他的课如此受欢迎，以至于其他教师的教室空无一人，而他的教室座无虚席。”这位修辞学家还讲述了一位失败的学位投考人的故事，在辩论会上，他无力辩驳，只能像个替罪羊似的坐在那里，旁观者嘲笑他是拉比(rabbi)；在宴会上，他的客人面对如此难以下咽的食物，提不起喝酒的兴致来，而且他必须花钱雇人听他的课。

学术地位与学术自由

中世纪教师的社会地位必须被置于一个不同于我们时代的社会体系的背景之下来看待。或许在意大利的城市里，我们看到了最接近于现代状况的现象，有证据表明这里的许多医学教师和罗马法教师在中世纪跟在现代一样拥有卓越的社会地位。许多神学家和教会法教师在教会里占据要职，如主教和红衣主教的职位。在神学家和哲学家中级别最高的通常是大学教师：托马斯·阿奎那、阿尔伯特·马格努斯(Albertus Magnus)、博纳文图拉(Bonaventura)，这个庞大的博士阵容宛如天使、战无不胜、无可非议、纯洁美丽、思维敏捷、多才多艺。多明我会修士(Dominicans)和方济各会修士(Franciscans)的身份只是部分地迫使他们退出了世俗社会。

如果如某些改革学家所言，教师的社会地位和自我尊重包括他们对大学事务的管理的话，中世纪俨然是教师管理大学的伟大时代。当大学不是一个学生社团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教师社团。这里没有重大捐赠资金，没有理事会，也没有存在于欧洲大陆和美国许多地区的社会控制体制。引人注目的是，大学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管理部门，不过他们把许多时间浪费在召开各种各样的大学会议上。在一个相当显著的程度讲，大学既自我尊重又自我管理，从而避免了理事或董事把教师们说成“雇工”的那种体制下的一些弊端。至于单个教师在这样的体制之下是不是更加自由则是另外一个问

题，因为这个教师法团倾向于对行为举止(如果不是对舆论的话)实行相当严密的控制，同僚专政是这个世界似乎无法避免的“近邻专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还剩下教师的知识自由权问题了，即教师是否有权利讲授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我们现在把它称之为学术自由问题。显然在这一点上，如派拉特(Pilate)所言，许多理解依赖于我们的真理概念。如果真理是通过研究而发现的东西，那么研究本身必须是自由不受约束的。但是，如果真理是权威学者已经揭示出来的东西，那么人们只需要对这些东西进行阐释即可，而且阐释者必须忠实于权威学说。毋庸置疑，后者正是中世纪的真理概念和真理讲授方式。中世纪人持有这样的观点：“信仰高于科学，它确定科学的边界，规定科学的前提条件。”^[7]安瑟伦(Anselm)说：“我信仰是为了有所知，我无所知是为了信仰。”如果理性有如此确定的边界的话，它理应保持谦卑。格雷戈里九世说，不要让巴黎大学的教师和学生“炫耀自己是哲学家，而要让他们努力成为通晓上帝知识的人”。发生在教师身上的许多典型故事已经证实了自负于知识且仅依赖于理性的危险，沉醉于自吹自擂中的他们会被这种危险吓得目瞪口呆。例如已经“如此清楚、如此精确、如此普遍地”证明了三一体教义的特内伊的艾蒂安(Etienne de Tournay)竟然宣称自己也可以如此容易地推翻自己的证据。中世纪的正统观念蔑视纯粹的巧辩，一方面是因为学校的许多辩论毫无结果，一方

51

52

面是因为理智过于自由地玩弄一个命题的话，很容易滑向异端。为了察觉和惩治异端邪说，中世纪教会组织了一个名为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的专门法院系统。

上述内容属于一般情况，那么实际的情形是怎样的呢？事实上，除了哲学和神学，其他学科的学术自由是普遍存在的。法学、医学、文法和数学教师通常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愿自由授课和辩论。由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问题，也没有与此有关的社会科学的讲授，所以产生麻烦的丰富源泉是不存在的。据我所知，没有一位中世纪的教师被谴责为宣扬自由贸易或自由财产或社会主义或不抵抗主义。另外，尽管个别人的著作可能被当众焚毁了，如同发生在罗马帝国后期的事情，但是在16世纪之前并未出现有组织的书籍审查制度。

至于哲学和神学，麻烦当然在于神学，因为哲学在不涉及神学问题的时候是自由的。不过在当时，哲学非常倾向于论述神学问题，在整个12、13世纪，基督教神学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异教哲学之间始终存在着时断时续的斗争。当阿贝拉尔试图运用逻辑推理方法研究神学时，这场斗争就开始了，斗争的继续始于同时代的拉波里的吉尔伯特(Gilbert de la Porree)，他将更多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知识指向了神学冥想。12世纪末，《新逻辑》已经被相当充分地吸收进神学当中了，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和阿拉伯学者的评注作品又适时传了进来，1210—1215年间，巴黎大学正式禁止研

习它们。1231年教皇下令对它们进行“检查并清除所有可疑之处”，但是至1254年的时候，它们已经变成大学文学课程里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了，不仅没有被剔除，反而以解释基督教信仰的方式与神学达成了和解。一代人的时间之后，阿威洛伊主义(Averroism)复发，强调物质永恒和天体决定世人行为的教义；1277年，巴黎主教谴责了该派别的219处谬误，并乘机对这些谬误借助文学科学生侵入神学的现象表示了悲痛之情。在这段时期里，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都在巴黎大学里讲授和研习，他的方法被托马斯·阿奎那借用来建立庞大的经院神学体系。其他人则为自己保留了一个范围广泛的哲学冥想领域，万一出现麻烦的话，他们可以借助哲学上正确的理论在神学里未必正确——反之亦然(*vice versa*)——的学说自保。

由于着眼于教学自由的问题，我已经仔细查阅了巴 54
黎文献资料中所有属于13世纪的文献。除了刚才提到的几次大争论，余者寥寥。1241年，巴黎大学校长和神学系教师们又检查出并谴责了10处谬误——一系列非常抽象的命题，涉及上帝本质的可见性、天使以及高尚灵魂在彼世——无论是在九重天，还是在天堂——的确切所在。1247年，由于神学科教师的提议，一个名为马斯特·雷蒙德(Master Raymond)的人好像被监禁了，同年，布雷斯凯恩的约翰(John de Brescain)被剥夺了授课权，因为他在逻辑学上的某些错误——“看起来接近阿里安(Arian)异

端”——混淆了两门学科的内容，而它们之间的界限早已被先人确定好了。大约在 1255 年，巴黎大学陷入了一场动乱，起因于所谓的“不朽福音”(Eternal Gospel)，这是一篇宣扬启示的文章，它预言 1260 年将开始上帝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教皇和教阶制都将被废弃。由于被方济各会的某些高级修士所接受，这些教义便成了修士与托钵僧(Mendicant orders)之间冲突的起因，但这场冲突并未产生非常有决定意义的结果。1277 年，巴黎大学收到牛津大学的一份通告，称其谴责了文学科教学中出现的 30 处谬误，这些谬误虽不属于异端，但也足以导致讲授这些内容的教师被免职；不过当我们在这些谬误中发现拉丁语名词的格和动词的人称后缀(ego currit, tu currit, 等等)皆被取消了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加同情那些不幸的学生而非被免职的教师。这令人想起学术自由的现代定义：“说自己想说的而无需考虑说什么的权利。”

这些仅仅是在神学最为活跃的历史时期里发生于神学冥想风潮中心的几个干预自由教学的显著例子，除认识到这一点之外，我们还必须指出事实上的自由大量存在。麻烦几乎全部产生于所谓的神学异端，或者是那些缺乏神学训练的教师对神学命题的过分玩弄。一般而言，那些安分守己的教师不会被打扰。就像 16 世纪的伟大法学家卡贾斯(Cujas)在被询问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时，回答说，没有人特别规定我必须是天主教徒或是基

督徒(*Nihil hoc ad edictum praetoris*)。甚至在防范更加严密的神学和哲学领域里,许多人也不见得发现自己被限制了。接受了以权威为出发点的原则之后,人们不会像我们现在感觉他们那样感觉到权威的局限性。篱笆对于那些不会想出来的人而言并不是障碍,许多在一个更具怀疑精神的时代看来似乎无法忍受的障碍物在经院哲学家眼里并不是障碍物。自我感觉自由的人就是自由的。

56

另外,习惯于现代世界多样化的人容易形成中世纪思想一成不变、千篇一律的错误印象。研究它的历史学家一再提醒我们,经院哲学不是一个学说体系,它包含许多学派,千差万别的派别和形形色色的观点之间争论的激烈程度不亚于古希腊人或我们现代人之间的争论。如果这些不同之处在我们穿越历史长河的眼里似乎微不足道或不太真实的话,我们只要把目光转向(例如)共相(*universal conceptions*)的本质——它划分了中世纪的唯名论者和唯实论者——这一古老问题就足够了。一般概念仅仅是名称,还是独立于个体之外的真实存在?如果我们仅仅把它当作一个逻辑学问题的话,听起来似乎有点枯燥无味,但是一旦把它变成一个关乎生存的话题的话,就足以让人兴奋了。宗教改革的潜在本质在于我们采纳唯名论的观点还是唯实论的观点看待教会;政治的核心问题主要取决于唯名论观点的政权还是唯实论观点的政权,由于最后这个问题的两面性,上百万人已经“莫名其妙地死去了”,毫无疑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潜意

识里并没有认识到他们为之奋斗的政治权威的终极结局问题，但是当以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具体形式表述出来的话，他们就能理解了。

当中世纪的教师磨练人类才智并延续知识传统的时候，他其实常常是在他的时代里以他自己的方式处理着人类的永恒福祉问题。

注释：

[1] E.G.Browne, *Arabian Medicine*(1921), p.93.

[2] *Op. cit.*, I, 254—255.

[3] 原文如此：格拉提安的继承人，大学的学生成为圣坛南面的修道院长和大祭司。

[4] Richer of Reims, *Histor.*, III, cc.45—54, 引文的译文参阅 H.O. Taylor, *The Mediaeval Mind*(Cambridge, Mass., 1925), I, 289—293.

[5] 译文参见 R.L.Poole, *Illustr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Mediaeval Thought*, 2nd ed.(London, 1920), pp.203—212; A.O.Norton, *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Cambridge, Mass., 1909), pp.28—34。我们对这些老师的了解主要来自于 Poole 的文章 “The Masters of the Schools of Paris and Chartres in John of Salisbury’s Tim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XXXV(1920), 321—342; 重刊在他的专著 *Studies in Chronology and History*(Oxford, 1934)中, pp.223—247。

[6]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MS. Lat. 4489, f.102; F.C. von Savigny, *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Rechts im Mittelalter*(Heidelberg, 1834), III, 264, 541, 553; 参见 Rashdall, *op. cit.*, I, 218(根据修订版的一个批注, “这个开场白实际是奥德弗雷德斯的一个学生写的, 他叫 Petrus Peregrossi, 在奥尔良大学教书”, *ibid.*, p. 219 n.3)。

[7] J.B.Alzog, *Manual of Universal Church History*(Cincinnati, 1876), II, 733.

中世纪的学生

信息来源

59

教师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谈论说：“如果没有学生的话，大学将是一个非常惬意的地方。”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从教师的角度考察大学；现在我们应该转向学生了，因为不管是被视为大学存在的必然弊端，还是被看作大学存在的主要理由，他们理所当然都不应该被忽视。中世纪的大学不是“上校团”(regiment of colonels)，而是“教师和学生团体”，现在我们必须把注意力投向大学的第二个且人数居多的组成元素了。

在中世纪，学生这个角色比教师更难捉摸，因为如果作为单个个体的话，他不如教师引人注目，必须被置于学生主体中进行整体考查。而且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学生主体的情况也是五花八门，所以难以将其普遍

60

化，一个时代和一所大学的真实情况可能相当不符合其他时代和其他大学的真实情况。即便是在创建时间短的美国大学里，不同的大学——比方说，17 世纪的哈佛大学、18 世纪的威廉和玛丽大学、19 世纪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和 20 世纪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不同；我们不可能依据这些被不加区别地从如此截然不同的源头里提取出来的元素描绘出一幅真实的图画来。在中世纪每一所大学的情况被按照年代顺序研究出来之前，不会出现普遍意义上的学生生活的合理描述，而且任何地方都没有开始系统地尝试这项初级性的工作。所以目前我们只能简要地陈述一下信息的主要来源以及它们对学生生活的阐释。

幸运的是，除了中世纪时代直接描写学生生活的零零散散的遗稿之外，我们还得到了相当多或多或少直接涉及学生情况的资料。首先是与学生有关的法庭记录——夹杂在小规模骚乱和屡犯罪行的细枝末节的单调描述里——它时常保留着一些生动的中世纪生活景象，如博洛尼亚大学的一个学生案例，一名手持短弯刀的学生在教室里与人斗殴，聚集在教室里的其他学生——他们

1 正在聆听一位出身高贵、成就显著的法学博士的讲座——因此而受到重大伤害和损失；再如 1289 年的案例，一名抄写员在教室前面的街道上袭击一名学生，在两名同伙的协助和怂恿下——“扔向他，打他”——“他用石头击中了这名学生的头部，血随即喷涌而出”，事毕之后，三

人溜之大吉。牛津大学验尸官的卷宗里记录了市民和学生聚众闹事的种种致命结局，最近出版的1265年和1266年的一份登记簿显示，博洛尼亚大学的学生利用教科书的出租和出售干劲十足地挣钱。当然还有大学和学院制定的法令，它们以明令禁止和罚款的方式限定学生的交谈话题，规范方形帽和长袍的式样及颜色——在我们看来如此中世纪化却又如此现代化的学位服，尤其是美国式的学位服；它们同时还得警惕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违法事件，如新学院制定的禁止学生在礼拜堂扔石头的法令，莱比锡大学针对学生向老师扔东西的不同情况——捡起东西但没有扔出去者，已经扔出去但没有击中老师者，击中老师完成自己险恶用心者——制定不同级别的处罚条例。编年史家有时也会中断对王公贵族的描述，穿插记叙大学学生及其所作所为，尽管他们倾向于——与它们现代的继承者报纸不无二样——关注学生违规乱纪的突发事件而非学校生活的健康惯例。 62

然后我们还有那个时代的传道士，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教师，他们在布道时会频繁提及学生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如果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证据来消除人们认为中世纪大学献身于圣经研习和宗教虔诚培养的错觉的话，巴黎的传道士们就能提供足够的证据。“学生的心灵被玷污了，”他们中的一位传道士说，“(他们的眼睛)盯着教堂牧师的薪俸和世俗的东西，(心里)盘算着如何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如此爱打官司、爱争吵，以至于彼此

之间无法和睦相处；不管走到哪里，巴黎还是奥尔良，他们都会扰乱这个地区，扰乱他们的同事，甚至扰乱一所大学。”他们中的许多人携带着武器在大街上闲逛，攻击市民，私闯民宅，凌辱妇女。他们之间因为狗、女人或者诸如此类的话题争吵不休，(恼羞成怒的话)或者挥剑斩掉对方的手指，或者只拿一把匕首，也不顾裸露在外的秃顶就突然投入战斗——见此阵势，全副武装的骑士也会畏缩不前。他们的同胞也纷纷出来参战，顷刻间，或许所有同乡会的学生都会卷进这场冲突中。巴黎的这些传道士还把我们带进了拉丁区的真实环境中，向我们展示了这里的种种消遣娱乐。我们听到了街道上的叫喊声和歌声——

3

时光流逝

我一无所获；

时光轮回，

我依旧碌碌无为——

听到了学生敲打手鼓、弹奏吉他的声音，听到了他们的“污言秽语”，听到了他们在布道坛和辩论会上的唏嘘声、掌声、大声叫好的喝彩声。我们观看他们嘲笑一位女邻居的假发，观看他们朝着过路人伸舌头、扮鬼脸。我们目睹了一名学生的生活点滴，他或者在窗前伏案苦读，或者与室友畅谈他的将来，或者接待来访的父母，或

者卧病在床得到朋友的悉心照料，或者在一名学生的葬礼上高唱赞美诗，或者拜访他的同学并邀请他回访——“我已经过来看你了，现在来我们的住处吧。”

各式人物都出场了。有家境贫寒的穷学生，他没有一个朋友，除了圣尼古拉斯，他需要寻找自己能够得到的施舍，或者通过搬运圣水或替别人抄写作业——字迹虽然清楚，但模仿得一点儿也不准确——挣点儿工资，有时太贫困了，以至于买不起书本或负担不起神学课程的支出，但他通常胜于比他富有的同学——他们拥有大量他从未看过的书。也有家境殷实的学生，在他的房间里，除了书和桌子之外，必然有一根蜡烛、一张舒适的床，床上铺有柔软的床垫和华贵的被褥，他总会因为抵挡不住诱惑而沉溺于中世纪人们对盛装艳服的嗜好，远远超出了学校法令规定的长袍、披肩和简朴服饰。然后 64 是不务正业和胸无大志之徒，他们在教师和学校之间游荡，从未听完全部课程，也从未完整地听完常规讲座。他们中的一些人——只关心学者名声和上大学所获收益的一帮人——每周只听一两次课，而且优先选择教会法讲座，因为这可以保证他们早晨有足够的时间睡懒觉。许多人在本该学习的时间里吃点心，或者在教室里睡觉，在剩下的时间里，就去酒馆喝酒或者想入非非；到了该离开巴黎的时候，为了炫耀自己的学问，他们开始搜集牛皮书卷，这些书的页边距很宽而且有精美的红色封皮，然后，带着博学的粗布袋和空虚的大脑，回到父母身

边。“这是什么知识，”一位传道士质问说，“窃贼可以将其偷走，鼠或飞蛾可以将其吃光，火或水可以将其毁于一旦？”他还引用一名学生的马连人带书一起掉进河里的例子作为证明。一些学生则不回家了，继续不务正业地享受他们的圣俸。甚至在假期里，当富裕学生带着仆从策马而去，穷困学生头顶烈日长途跋涉回家的时候，许多无聊之徒仍然留在巴黎，害人害己。我们应该记住，中世纪的巴黎不但是无可匹敌的“科学之父”，而且也是一个充满欢乐、友情和多种乐趣的地方，它不仅是刻苦求学者的理想去处，也是乡村神甫的度假胜地；因而学生们有时不适当地延长他们的逗留时间，并用远非修辞学上老生常谈的话语表达离开时的悲痛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后，中世纪的诗人也熟知大学的学生，其中一位诗人吕特伯夫(Rutebeuf)描述了13世纪的巴黎大学，与布道士所言截然不同，而在前一个世纪里，豪特维莱的琼(Jean de Hauteville)则向我们展示了穷学生的悲惨生活和勤奋学生趴在书本上睡着了的样子，同时期的奈杰尔·怀尔克(Nigel Wireker)却用驴子的称呼讽刺在巴黎求学的英国学生布鲁内鲁斯(Brunellus)——乔叟笔下的“驴子伯内尔(Burnell)”——他在巴黎大学学习了七年，没学会一个单词，结课时跟开课时一样，只会发出驴叫似的声音，最后离开时却信誓旦旦地要成为一名修士或主教。乔叟描绘的牛津大学教士形象无人能出其右：腹中空空、衣衫

褴褛、不谙世故——

他的床头堆积着
二十本论述亚里士多德及其哲学的著作，
红色或黑色封皮装订，
华丽的长袍，小提琴或轻快的音乐与这里无缘。
他开口即是道德文章，
他快乐地沉醉于学与教之中。

66

但是毕竟没有人会比学生更了解自己的生活在，因此最后我希望尤其能从学生所写的和为学生而写的中世纪学生作品中获得更多的信息。有关过去学校生活的这类遗稿主要分成三个类别：学生手册、学生书信和学生诗歌。我们将按照这个顺序逐一考查。

学生手册

针对中世纪学生的一般性忠告和建议的手册不需要过多考虑。关于学生全体职责的正式论著体现了中世纪说教思想倾向的典型特色，不过它们所包含的忠告却流于普遍，不仅适应于好几个时代，而且缺乏具体的例证，同时代的布道却因为有例证而鲜活生动，从而成为反映大学生活的有用资料。

更有趣的一种学生手册是学生辞典，它的出现归功于拉丁语所享有的中世纪教育通用语言的地位。教科书

是用拉丁文写的，讲座是用拉丁文讲授的，更重要的是，学生们进行各种交流时，必须使用拉丁语。制定这一规则除了刺激学生学习拉丁语之外，或许也是为了监督学生的谈话，但是这一规则是靠刑罚和告密者(称为狼)来强制推行的，大学新生(yellow-beak，中世纪的称呼)会发觉自己的拉丁语知识太贫乏了，以至于在新的社区里无人听得懂他。为给这类学生提供方便，13世纪巴黎大学的一位教师，加兰的约翰(John of Garlande)准备了许多说明性的词汇，根据不同的话题，将它们排列在巴黎街道上，为了便于学生边走边看，每个话题所占据的空间都比较大。在它们的指引下，学生们可以出入各个地区，进行各种交易，从圣母院前庭(Parvis Notre-Dame)的书摊和附近新街(Rue Neuve)的肉市场到大桥(Grand-Pont)的货币兑换台和金首饰店以及圣拉扎港(S.-Lazare)弓箭制造商的店铺，更不会错过学生阶层最有可能结识的佣工阶层(ouvriers)。除了职业所需的特殊工具如桌子、蜡烛和文具，马具商、手套商、皮货商、鞋匠、药剂师，所有这些人的物品，学者都有可能用到；不过与他打交道最多的还是食品类和酒类供应商，他们的代理人沿着拉丁区的大街小巷生机勃勃地经营着生意，把劣质商品出售给学生及其仆从。有卖酒的小贩，叫卖着酒店里不同品质的样品酒；有水果商，用生菜叶、水田芥、樱桃、梨和青苹果诓骗学者的钱财；还有晚上叫卖松软油酥点心的小贩，挎着严严实实遮盖起来的篮子，里面装着薄脆饼、蛋奶烘

饼和油炸肉饼——学生们玩掷骰游戏时常下的一种赌注，有人幸运地扔出六点的话，他们就习惯性地把篮子从窗户里吊上来。糕点商(Pâtissiers)还有更多适合学者口味的食品，中间夹鸡蛋和奶酪的果馅饼以及加胡椒粉的猪肉、鸡肉和鳗肉饼。学生的仆从们则常常光顾烤肉商(Rôtisseurs)，他们不仅垂涎烤肉叉上的鸽子肉、鹅肉和其他家禽肉，而且喜欢吃添加大蒜和其他浓烈调味酱的生牛肉、生猪肉和生羊肉。然而这些饮食并不是针对穷学生而言的，限于干瘪的钱包，他们只能购买牛肚和各式腊肠，而且在买卖过程中，双方很容易发生争吵，甚至“屠夫被愤怒的学生屠杀”。

这类辞典易于转化成另一种形式的著作——对话指南。这种学习外语的方法历史很悠久了，古埃及的残存作品就可以证明。现在不警觉的旅行家——他们预备借助奥朗多弗*的方法克服语言障碍游遍整个欧洲——依然会落入它的圈套。不过，在中世纪后期的作家眼里，它似乎提供了一个将拉丁语教学与保持学校良好风纪相结合的特殊机会，中学和大学里都留下了这类遗作便于我们仔细研究。最有趣的一篇手册题为《打算上学生大学并在那里有所收获的学生的指南书》，尽管根据最一致的形式，它是1480年左右专为海德堡大学的学生量身定

* 奥朗多弗(Ollendorff)，翻译法的代表(翻译法是用母语翻译教授外语书面语的一种方法)。——译者注

制的，但是稍作修改的话，它可以适用于德国的任何一所大学。我们可以称它为“海德堡大学的罗洛”(Rollo at Heidelberg)。此书的十八章内容从注册入学到学位获得分门别类地对这名学生进行了指导，而且附带着告诉他许多对双方而言都没必要的话题。到达学校时，这位年轻人开始登记注册，他来自乌尔姆(Ulm)；父母生活景况一般；他来这里学习。然后遵循德国的风俗习惯，他准时受到了恶作剧的捉弄，他被装扮成一头长着触角和獠牙的邪恶野兽，好管闲事的同学会把触角和獠牙摘掉，并且聆听他的忏悔，替他做出盛宴款待围观者以示悔罪的决定。随后，他开始了自己的学习，每天聆听三次讲座，学习唯名论，反对唯实论，学习特伦斯(Terence)的喜剧，质疑法律，学习辩论各所大学的优点、食品的价格、大学镇啤酒的质量。然后，我们发现他和他的室友因为一本放错位置的书争吵不休；发现他踩着第一声放学铃声奔向餐厅，他们在那里讨论小牛肉和蚕豆的相对价值；或者发现他在尼卡尔(Neckar)以外的旷野里或沿着著名的哲学家之路(Philosophers' Road)——这条路受到许多代海德堡年轻人的青睐——散步，而且边走边与他人用拉丁语交谈着鸟、鱼之类的话题。然后是更为简短的对话：这名学生违反了校规；他借了别人的钱，并如数归还了；他坠入了爱河，但又恢复如初了；他去听意大利一位胖修士布道了或去市集看杂耍了；他知道三伏天就要来了——动动脑筋的话，他就会知道！最后，我们的这名

学生被他的父母告知，到了该拿学位和回家的时间了。他开始为此焦躁不安；他没听过几节课，但他不得不起誓保证自己照常上课了；他没有努力学习，招惹了许多教师的反感和敌视；他的老师劝他不要尝试考试；他害怕考试失败的耻辱。但是他的对话人引用奥维德的一句至理名言安慰他，启发他说，明智的礼物分配会助他一臂之力——几个弗罗林就可以让他赢得所有人的好感。对话人劝他写信向家里要更多的钱，盛宴款待他的教授们；如果将他们招待好的话，他就无需担心考试结果了。这份建议对该时代的教育标准作了一个奇特的解释；建议似乎被遵从了，因为手册在结尾之前加上了一套请老师赴宴和免费洗浴的礼节。 71

如果大学生需要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之类的初级汇编书的话，很显然这类汇编书在低一级的中学里也有大量的需求空间，在那里它们倾向于采取容易被学生记住的拉丁语对话诗的形式。这类规诫学生行为举止的法则 (*statuta vel precepta scolarium*) 似乎特别流行于 15 世纪后期的德国城市学校，历史学家对初等教育的最新研究已经使这些学校的重要性充分展现出来了。因为常常漫游于各个城镇，就像更早时期的漫游学者，所以这些德国男孩非常需要遵守礼仪手册所宣传的道德准则。古训的开篇即铭记上帝、遵从教师，不过学生们在做礼拜时也得循规蹈矩，在唱诗班歌唱时要抬高声音——强制学生做礼拜并在唱诗班唱歌是这些学校的一个普遍特色——另

外要保持书本的整洁，按时缴纳学费。早晨起来要洗手、洗脸，但未经许可，不得进澡堂洗澡，男孩们更不能溜冰或打雪仗。星期天是玩耍的时间，但他们只能在教堂院子里活动，即便在那里也要小心翼翼，切忌掷骰子，也不得破坏墙上的石头，或越过教堂向外扔任何东西。不管是出外玩耍，还是待在家里，必须始终说拉丁语。

相比较而言，15 世纪的一本手册更加系统化，它的手抄本形式现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里。^[1]“既然因为愚笨，仅靠理论学习，年轻人不能提高拉丁语知识”，手册作者就为他们准备了一套礼貌用语，它囊括了教士们最经常使用的表达方式。手册开篇即学校生活的谦恭有礼，因为对老师的服从和应有尊敬是古训的开端，为此男孩们要学会如何问候老师并向他道别，做错事了如何请求老师的宽恕，如何邀请老师吃饭，或与自己的父母共进晚餐——这一条就有 6 种表达方式！他也要学会如何得体地回答那些企图检查他所学知识的人，“这样的话，他在父母眼里就不至于像个傻子”。“如果老师问，‘你在哪里耽搁了这么长时间？’”，他必须有备而来，不但拿不可避免的头痛病或起床晚了的借口为自己辩解，而且要陈述一些乡村男孩都熟知的理由。他不得不做家务活，或者给牛喂食，或者给马喂水；由于参加一场婚礼，或者收获葡萄，或者填写账单，或者——对德国男孩而言——帮忙酿酒或取啤酒或招待客人喝酒，他也被耽搁了。

在学校里，早晨唱完赞美诗进行“精神提神”之后才吃早餐满足身体所需，之所以安排在学习时间之后是因为“刚刚吃饱饭时，人的想象力会受到抑制”。在午餐会上或操场上交谈时，“学生们会下意识地从小拉丁语改说母语”，针对说德语的学生，谨慎的老师发明了一个笨蛋的象征物，一个叫驴的东西，拿着这个东西的人不得不费尽心机地把它传给另一个人。“谁要买钢笔？”

“我要买钢笔。”“你拿着一个驴。”“啊哈，当你说错了的时候，它就归你了！”有时候，上了当的学生会要求晚祷之后与欺骗他的学生见面，结果通常是双方的一番厮打。因为学校禁止打架斗殴，男孩们就被教育消除彼此之间的敌意，用拉丁语对话的形式倾诉怨言。“天黑之后，你还在城外游荡。星期天你戏弄了一个世俗人。星期一你去游泳了。你没有参加晨祷，你在弥撒礼上睡觉。”“尊敬的老师，他弄脏了我的书，不管我走到哪里，他都跟在后面叫嚷，辱骂我。”除了正式的辩论练习，学生们还讨论一些时事，如街头斗殴、亲戚的婚礼、即将与萨克森公爵对决的战争、到达埃尔富特城(Erfurt)的途径——他们中有人年满 16 岁的话就要到那里上大学。这一天中的苦难经历是老师的拉丁文法测验，因为 74 每位学生都会被依次提问(auditio circuli)。随着上课时间的临近，循规蹈矩的学生开始练习拉丁文法的变格和动词变位，不务正业的学生则开始忐忑不安。一些人希冀老师可能来不了了。“他有客人要接待。”“但是他们

会及时离开的。”“他可能去洗澡了。”“但是距离上次他去澡堂还不到一周的时间。”“在那里，他来了。绰号是狼的这个人，他毫不拖沓地出现了。”最后，这些战战兢兢的学生只得求助于唯一的希望了，挨着答应给他提示的同学坐下。

“当背诵结束，作业分发时，随着回家时间的临近，欣喜之情开始在年轻人中间弥漫开来”，他们开始肆无忌惮地闲聊，“什么内容被老师省略了，以防止它变成违规乱纪的手段”。然而，喜悦之情又被下课之前的一场争夺赛冲淡了，“关于手相术(Palmiterium)的一场严肃而又热烈的辩论”，直到有人赢得了奖品，另一个人则带着笨蛋(asinus)的耻辱直到次日。

放学之后，男孩们开始在教堂院子里活动，书中提到的体育活动有铁环游戏、打弹子游戏(显而易见)、球类运动(四旬斋期间进行)和一种计算游戏。作者还把铁环细分为手扔的和滚动的，木质的和石质的，但是这一话题立刻变得太深入了，以至于超出了他的拉丁语知识，所以在这个话题还没进行完的时候，这本著作就出其不意地结尾了。

某些类型的学生手册也会涉及中世纪另一种指南书——礼仪手册——所占据的领域，常冠以“文雅之书”、“餐桌上的礼仪”之类的标题，13世纪以降，极为流行。不过这类手册语言上不及卡斯提尔的《朝臣论》优美，内容上不如现代的礼仪之书详尽。还未精通刀叉

用法的人几乎无益于提高社交的高雅程度，中世纪礼仪手册的读者们在行为举止方面还处于入门阶段。早晨要洗手，如果有时间的话，洗洗脸；用你自己的毛巾和手帕；用三个手指吃饭，不要狼吞虎咽；不要在餐桌前叫嚷或争吵；不要盯着你的邻桌或他的饭菜；不要妄加评论食物；不要用你的刀剔牙——这类要求以及其他更为初级的要求就是这个时期拉丁人、法国人、英格兰人和意大利人的行为准则，不过这些内容通常以诗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偶尔也有对该时代社会礼仪方面更进一步的论及：用你的刀剔骨头，不要咬它们；吃完之后，把它们放在一个碗里或者扔在地上！

学生书信

76

如果中世纪的学生书信能够以不拘礼节、不装腔作势的叙述形式保留给我们的话，我们将得到最为生动的一幅大学情景图。对我们后人来说有些不幸的是，在书信写作方面——跟其他方面一样——中世纪是一个讲究形式和典范的时代；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书信写作很少是个人情感和经验的表述，更多时候是在费力抄写另外一个人的书信，在需要的地方稍作改动以适应新情况。如果有表述新鲜东西或个人情感的书信的话，它也不大可能被保留下来，因为对于后来的写信者——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他们“如此关注典型，如此忽视个人”——而言，它是最不可能有用处的书信。结果以中世纪第一手作品

形式摆在我们面前的学生书信都是经过了书信形式和优秀书信写作人的采集这个中间环节才流传下来，它们的个人趣味大都被删掉了，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们才可以更加真实地反映出大学生活最基本、最普遍的方面。

要钱是中世纪学生书信的最主要内容，“学生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要钱，”意大利一位书信作家笔下的一位父亲不耐烦地说，“永远不会有一封不要现金的家书。”如何保证基本生活必需品无疑是摆在中世纪学生面前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为此，修辞学家们把许多书信样本摆在学生面前以证明自己技艺的现实价值。信函通常是写给父母的，有时候也写给自己的兄弟、叔父或教会赞助人。就这个永远巧妙的主题而言，一个常被模仿的练习竟然包含 22 种接近大主祭的方法。一般而言，学生都会如是叙说，在一个如此这般的学问中心里，他既健康又快乐，不过他急需要钱购买书本或预备其他的必要花销。这里有一封牛津大学的书信样本，它比通常的书信稍微个人化一些，而且是用不太常见的拙劣拉丁语写的：

B.写给尊敬的主人 A.，问候。写此信是要告诉您，我正在牛津大学里刻苦勤奋地学习，但是钱的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我的进步，因为现在距离我花完您上次寄给我的最后一分钱已经两个月了。这个城市很

奢华,需求很多;我需要租房,购买生活必需品,筹备其他许多东西,我现在还不能具体说明。为此,我恭敬地乞求父亲大人,看在上帝的分上,给我援助吧,这样我才能完成已经开了好头的学业。因为您肯定知道,没有巴克斯和克瑞斯的话,阿波罗也会感到寒冷。 78

如果父亲出手不大方的话,还有更为具体的原因可以催促父亲多出钱:这个城镇消费很高——大学城镇总是这样!——物价尤其高,原因在于一个寒冷的冬天,或者一场灾难的袭击,或者庄稼收成不好,或者学生人数不同寻常的少;上一位信使遭抢劫了,或他本人带钱潜逃了;儿子从同学或犹太人手中再也借不出一点钱了;等等。学生的不幸常用催人泪下的文字刻画,其间不乏对父亲虚荣心和爱子之心的呼吁。在博洛尼亚大学,我们听到了对自己最耸人听闻的糟蹋,这位年轻人说他必须沿路挨家挨户地乞讨,喊着“噢,善良的主人”,但是仍然会两手空空地回到家里。一名学生用奥地利方言写信说自己正处在地狱的最深处,面包生硬且发霉了,喝的水里掺和了泪水,黑暗如此凝重,事实上已经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另有一名学生说自己睡在没有任何遮盖物的稻草上,光着脚丫子或上身走路,吃着难以启齿的食物——一个设计好了的讲述给自己的一个姐姐听的故事,作为回应,他得到了一百苏(sous tournois)、两床被单、10厄尔(ells)上等布料,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他姐姐瞒

着自己的丈夫寄过来的。沙特尔的两名学生对此作了一个简要的总结：“我们没注解什么，但我们拥有钱。”

对这类请求的合适答复自然是一封饱含深情的回信，既赞美这位年轻人勤奋刻苦的好习惯，又把他渴望得到的钱一并寄过来。有时，学生也会被告诫节省自己的开支——他本来可以靠原来的东西生活更长一段时间，他应该记住自己姐妹的需要，他应该赡养自己的父母，而不应该再从他们那里要钱，等等。一位父亲竟然援引贺拉斯的话为自己辩解说，葡萄园破产了，恳请儿子原谅自己无能为力。经常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即父亲或叔父听到了有关这名学生的负面报道，他必须立即写好回信，义愤填膺地进行否认，使他们相信这类诽谤纯属仇人无事实依据的胡编乱造。这里有一个父亲写信责备儿子的例子，选自弗朗什-孔泰大学(Franche-Comté)一个非常有趣的书信集：

写给住在奥尔良的儿子 G., 贝桑康(Besancon)的 P. 送去父亲热情的祝福。有人写信说：“他既荒废学业，又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浪子。”我最近才知道你生活放荡、懒散，只一味放纵自己，拒受管束，成天寻欢作乐，不愿做正经事情，别人学习的时候，你却在弹吉他，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即你只学了一卷法律书，而比你刻苦的同学已经学完了好多卷。因此我决定借此规劝你彻底悔悟自己放荡不羁、漫不经心的脾性，

这样你才有可能不再被称为浪子,才有可能洗刷耻辱,换得好名声。

从普罗旺斯的庞塞(Ponce de Provence)的范例中,我们发现一位教师写信给一名学生的父亲说,尽管这个年轻人功课做得很好,但他有点儿桀骜不驯,明智地规劝或许对他有所帮助。自然这位教师不希望被学生知道消息是从他那里传出来的,所以这位父亲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听说——不是你老师所为,尽管他不应该向我隐瞒这些事情,而是通过某一个可靠的渠道得知——你并没有像一名好学生所应该做的那样在寝室里学习,在校园里活动,而是寻欢作乐,四处游荡,不服从你的老师,沉迷于玩乐和其他一些我现在不愿意在信中提及的不光彩行当。

然后是要他改邪归正的惯常规劝。

奥尔良大学的两名学生如此描述他们到达这个学问中心的感受:

写给亲爱的、尊敬的父母 M·马特尔(骑士)和 M(他的妻子),儿子 M和 S.送上祝福和忠孝。写此信是为了告诉你们,承蒙上帝的恩惠,我们现在正在奥尔良城里健康地生活着,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当中,

1 时刻不忘加图的话，“了解任何知识都值得赞扬”。我们占据了一个很好的住处，这里距离学校和市场只有一户之隔，所以我们每天上学都不会弄湿鞋子。在这栋房子里，我们还有许多好同伴，他们都精通学业，而且有极好的习惯，这是我们非常欣赏的一个优点，因为正如大卫王所言，“跟一个正直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变得正直”。

这类年轻人通常不愿意放弃学校生活，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请求家人允许自己延长学习时间；战争要爆发了，父母或兄弟去世了，遗产需要分割，但他总是恳请延期回家。他渴望“在帕拉斯(Pallas)的营地服役更长一段时间”；无论如何，他也不能在复活节之前离开，因为他的老师刚刚开始重要的讲座。一名学生收到锡耶纳的一封信要求他回家迎娶一位有吸引力的女士；他回答说，他认为为了一个女人放弃学业是愚蠢的，“因为一个人或许总会得到一个妻子，但是知识一旦失去的话，永远不会失而复得”。

2 不管怎样，告别学校的时刻最后必然会来，那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毕业典礼或当时所说的学位获得的花销了。因此巴黎大学的一名学生请求一位朋友代自己向父亲详细解释——“因为天真纯朴的外行人理解不了这样的事情”——为何说经过许多年的学习之后，只因为缺少举办学位获得宴席就会阻碍自己毕业。奥尔良大学的 D·

博特里尔写信给图尔的亲戚说，他正在努力学习最后一卷法律书，学完之后——只要他们寄给他 100 里弗赫以备必要的花销——就可以获得法律资格证书了。关于博洛尼亚大学的学位授予情况，我们已经在前一章中描述过了。^[2]

学生诗歌

与在时间上涵盖整个中世纪后期的学生书信不同，中世纪的学生诗歌，更确切地说最优秀的学生诗歌，仅限于相对短暂的时期，大致锁定在 1125—1225 年间，与 12 世纪文艺复兴的古典阶段密切相连。这类诗歌的创作人大部分是该时期的漫游教士，包括学生、以前的学生甚至教师，他们游走于各个城镇切磋学问，更具冒险性的是，他们名义上是教士，却过着非教士的生活。“由于远离故土，”西蒙兹说，“卸去责任，囊中羞涩，心情轻松，无忧无虑，寻欢作乐，他们任由自己无拘无束、声名狼藉。”12 世纪的一位修士说：“他们惯于漫游整个世界，游览各大城市，直到数不胜数的知识压得他们发疯；如在巴黎大学学习‘自由七艺’，在奥尔良大学学习古典文化，在萨莱诺大学学习医学，在托莱多大学学习巫术，但他们不在任何地方学习举止风度和道德规范。”⁸³不过，他们的主要聚集地是新文艺复兴的中心——法国北部地区。

这些漫游教士自称为歌利亚德(Goliardi)，可能暗指腓

力斯丁人歌利亚(Goliath the Philistine)，他们的诗歌通常被称为歌利亚德诗歌。这类文学作品绝大多数是匿名作，尽管最新研究已将这个群体中的某些作者个人化，代表人物是1142年左右奥尔良大教堂教士麦斯特·修(Master Hugh)口中的首席主教(primate)和所谓的桂冠诗人(archpoet)。这位首席主教，尖酸刻薄、精灵古怪、声名狼藉，但是作为“一位令人钦佩的即兴创作家——如果全身心爱上帝的話，他本应该在教会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应该最有益于上帝教会”，好几代人敬仰他的大名。桂冠诗人在1161—1165年间主要出现于意大利，春天和夏天，他“自力更生”，但是刚一入秋，他就得向保护人科隆大主教索要汗衫和斗篷。一次，他接到命令，让他在一周之内为皇帝写一首叙事诗，他回答说，自己腹中空空，不能写作——他的诗文质量则取决于他所喝酒的质量：

我饮什么酒就写什么文章。

他肯定随时都能获得好酒，因为他创作了歌利亚德派最杰出的作品《一个歌利亚德的告白》(Confession of a Goliard)，他用令人难以忘怀的诗文描绘了帕维亚(Pavia)令人难以抗拒的诱惑，其中包括颂扬在小酒馆中纵情享受的有名诗篇：

死在酒馆里

是我的心愿；
生命终止时
愿酒近在嘴边；
天使们会用快乐的朗诵呼喊，
“崇高的天主，
请赐予这酒鬼恩惠和赦免！”*

虽然仍旧使用拉丁文创作，歌利亚德诗歌却已摒弃了古代诗歌的格律制，开始使用现代诗歌的押韵和重音，但是即使是最好的现代译本——例如我正在引用的约翰·阿丁顿·西蒙兹的译文——也不能再现原文的放荡不羁、轻快活泼和节奏的自然流畅。它的创作者深谙古典神话，尤其熟悉奥维德的作品，他的格言被人们自由效仿，甚至在严肃的克吕尼修道院里也不乏效仿者。绝大多数歌利亚德诗歌的古典色彩是它们直言不讳地表达异教徒式的生活观念。它们的上帝是维纳斯(Venus)和巴克斯，还有掷骰之神德西乌斯(Decius)。爱情、美酒、春天、大路朝天、浪迹天涯，这些是它们的共同主题；其精神实质是强烈的现世享乐精神，即纯生活享受，等同于人们从古希腊或古罗马的诗人身上，或从下一个时代——学术界仍然珍爱的一个时代——的嘹亮歌声里发现

* 参见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著，夏继果译：《12世纪文艺复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146页。——译者注

的那种精神：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一般而言，歌利亚德诗歌不是反映个人的诗歌——我们从中几乎找不到某个特定地区的描写——而是反映中世纪教士阶层放荡、快活，名声不太好的生活层面。据称，由于不成规矩的规矩，这个著名的流浪者团体接纳任何背景任何地区的人——发起过叛乱的人、赌徒和喧闹作乐者——并且自诩每个成员皆只有一件外套蔽体，他们游走于各个城镇，沿路乞讨要钱，那听起来就像诗歌形式的学生书信：

我，一个游学青年，
天生注定含辛茹苦，
每每因贫困而疯狂。

我满腹经纶，
却仍为生计奔波，
但愿不要因为那该死的钱，
把我的学业耽搁。

岁月磨坏了我的衣衫，
单薄而破旧；

寒冷常常侵袭我，
温暖已离我远去。

86

我很少到教堂，
适时地去唱赞美诗；
弥撒和晚祷我都错过，
虽然我真心把它们爱。

哎，尊贵的 N——，
乞求你尽力，
赐予我生活所需，
上帝定会回报于你。*

现在思考你自己吧
就像思考圣马丁；
为这个衣不蔽体的朝圣徒披上衣服，
用祝福的话将他送别。

上帝会因此超度你的灵魂，
让它永远平静，
你将会在他的天国里
享受到圣徒的幸福。

* 参见《12世纪文艺复兴》，第316页。——译者注

路边酒馆的同道中人则用这样的歌声招呼彼此：

我们大家东游西荡，
高兴快活，自由自在，
得啦，嗒啦，咚！

我们狂吃，尽情享受，
我们痛饮，酒兴未艾，
得啦，嗒啦，咚！

我们大笑，前仰后合，
衣衫虽破，却也痛快，
得啦，嗒啦，咚！

我们狂放，戏谑一切，
对酒当歌，醉倒失态，
得啦，嗒啦，咚！*

另有一首诗则描绘了聚众喝酒的酒徒：

一些人在赌钱，一些人在喝酒，
一些人如行尸走肉般活着；

* 参见《12世纪文艺复兴》，第315页。——译者注

在那群花天酒地的人中，
一些人被剥去了外套和上衣，
一些人捞得了上等绒毛的衣服，
一些人则赤身裸体；
没有一个人畏惧死亡的入侵，
所有人都争相喝酒。

然后他们开始亵渎神灵似地举杯饮酒，为所有囚徒和俘虏举杯一次，为所有活着的人举杯三次，为全体基督徒第四次举杯，为献身于信仰的人第五次举杯，如此这般连续下去，为游历山川或陆地的人第十三次举杯，最后为国王和教皇举杯而且无限量地喝。这类诗歌是一个 88
“不禁酒”时代的清晰写照。

经常提及饮酒和性欲的歌利亚德诗歌包含大量模仿诗文和讽刺诗文。公众熟悉的经文和礼拜仪式是它们最常诉诸的对象，在题为《酒徒的弥撒》(Drinkers' Mass)和《赌徒的职责》(Office for Gamblers)两篇诗歌中，作者通过诙谐的模仿，嘲弄任何东西——《圣经》、献给圣母的赞美诗、弥撒的献祭经文。一篇题为《白银马可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s of silver)的诗歌是最著名的讽刺诗文之一，它嘲讽了教皇权。不过当时许多歌利亚德诗歌都把罗马当作辛辣抨击的对象，这篇诗歌仅仅是其中的一篇，《歌利亚主教》(Goliath the Bishop)则淋漓尽致地刻画了高级教士傲慢自负、冷酷无情、贪婪无度的

丑恶面孔。一般来说，这些意见都出自低级教士之口，尤其是那些自由散漫、东游西荡、违规乱纪的教士，他们经常出现在学校里或大路上，属于教士界的“行吟诗人”(jongleurs)，他们是9世纪之后教会立法的常见对象。

这类诗歌与中世纪的传统观念如此相左，以至于一些著述家否认它带有中世纪特性，其中一位说：“它只是在时间纪年上属于中世纪。”其他人则找出了它与文艺复兴精神或宗教改革精神之间的姻亲关系。要想与历史的精神实质保持一致的话，我们还需扩展对中世纪的认识以符合中世纪生活的客观事实。歌利亚德既不是文艺复兴之前的人文主义者，也不是宗教改革之前的改革家；他们是中世纪时代的人，是为自己时代舞文弄墨的一帮人。如果这些教士——来自北欧，主要是法国——的作品看起来抢了文艺复兴之先的话，那么这或许意味着文艺复兴早已开始，而且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专属意大利。如果这些诗歌作者比我们所期望的教士样子更加世俗、更加注重享受的话，我们必须学会期待一些不同的东西。现在从讽刺诗歌中——就像从叙事史诗和戏剧中——我们获知了更多有关俗界和教界之间密切渗透的信息，由于下一个时代的凭空现象而横亘在它们之间的严密隔板再也不会把它们分开。不管带有世俗精神还是宗教精神，歌利亚德理所当然都是人；他们敏锐地洞察生活，热情地感受生活，并提笔写下自己的所闻所见。

总结

为了保持平衡，我们现在应该谈论一下好学生这个不太显眼的元素了。拉什达尔说：“有德行学生的生活没有历史记载。”^[3]在所有时代里，好学生总是不如比他精神抖擞的坏学生引人注目。所以布道里称颂的理想学生略显苍白，他们顺从、恭敬、求知心切、听课认真，辩论勇敢，甚至晚间沿河边散步的时候也思考功课。手册 90 中赞扬的理想学生是把他们的箴言付诸实践的人。书信里提到的模范学生总是写信人的自我标榜，全身心地学习，尽管钱有点儿不够。诗人眼中的好学生——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虽然学生诗歌“并非全都放荡不羁或宣扬性爱或亵渎神灵”^[4]，但其中许多诗歌就是这样，我们不能从这里寻找更为严肃虔诚的学校生活层面。豪特维莱的琼笔下的贫困而勤奋的学生可以代表一大部分学生，但他的写作题材并不能代表诗歌主体的写作题材。好学生最经常做的事情是坚持不懈地学习，课堂笔记和辩论最能表现他的刻苦勤奋。关注大学教育方面的文献资料也是学生生活的资料来源！人们已经注意到如今校友重聚时，大家追忆最多的是学生时代的胡作非为，而不是天天按时完成学校规定的学习任务。今天的一个勤学男孩永远也不会以这样的身份闯入报纸的头版头条，看起来也没有一个人适合创作一个“以好学生为特色”的剧本或制作一部同样题材的影片。但是熟悉当代大学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认真勤奋的学生大量存在，事实最终

证明好学生在学校里经过努力取得的成就将会在他以后的生涯中反映出来。中世纪也是如此。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法律的学生坚决认为他们应该从教师那里获得与所交学费相匹配的教育。索邦的罗伯特描写的考试要求严肃认真地备考。在中世纪大学里，职业动机是激励学生学习的一个强大动力，不仅如此，学生们也的确非常热心于知识，他们孜孜不倦地辩论着各类知识话题。至少，在规模比较大的大学里，知识生活相当活跃，甚至有点儿“知识宗教”的意味，中世纪早期的时候，学生们就受其号召跟随阿贝拉尔走进荒野，就地搭建棚屋以便受益于他的谈话。中世纪时代的书本大都由大学教授们编写，在书籍编写的时候，学生们就能先睹为快，在源头汲取知识的活水。跟现在一样，当时大学的道德水平取决于知识生活的紧张和严肃。

如果我们把学生文学作品的主体视为一个整体的话，它最显著也最令人失望的特征就是个性缺失。学生手册是供所有打算上大学的学生使用的。书信写作也尽可能普遍化，以满足任何一个缺少金钱、衣服或书本的学生的需要。即使是诗文——我们本应该有某些权利在这里看到个人情感的表达——也带有中世纪绝大多数诗歌所具有的普遍性特征；就绝大多数作品而言，它们代表的的是一个阶层而非单个个体的意见和愿望。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记住学生作品所具备的这个特征——如果说它剥夺了个人兴趣的话——也增加了它们自

身的历史价值。历史学家论述一般而非个别，他的知识必须建立在费力地收集和比较单个事实——它们往往数量太少，或者不足以作出一个合理的概括——的基础上。就这些学生记录而言，这项辛苦的工作早已完成了；在流传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它们已经丧失了在学生手中具有地方性、局部性和特殊性特征的东西，从而变成了——鉴于现代信息的性质，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有望把它们变成这样——数个世纪里学生生活的普遍经历和体验。

正是这个广泛意义上的人性促使中世纪的学生作品变成现代世界特别关注的一个对象。在本质上，尽管不是在形式上，其中的许多作品几乎就是现代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典型写照，正如它们是中世纪牛津大学或巴黎大学的典型写照。拉丁文对话和辩论、博洛尼亚大学的污蔑和大桥上的钱币兑换商显而易见属于中世纪，而不是我们时代的东西；但是金钱、衣服、房间、教师、书本、美酒佳肴和良师益友则是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兴趣话题。一位历史学教授曾经说，历史教学的最大困难 93 在于让学生相信过去发生的事情并非与我们毫无关联。中世纪时代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甚至在某些方面远过了古典时代，人们很难意识到过去和现在的男人和女人毕竟是同样的人。我们需要不断地被提醒，人类发展的基本要素在各个时代里几乎是一样的，而且只要人性和物质环境照旧持续下去的话，它们就不会发生改变。在与

生命和知识的关系上，中世纪学生与现代学生之间的相似程度要比人们常常猜想的程度大得多。如果说中世纪学生的生活环境不同，他所遇到的问题却与现代学生如出一辙；如果说他的道德品行较为恶劣，他的志向却与现代学生一样积极；他所面对的竞争也同等激烈，他对知识的渴望也同等热切。对他而言，就像对我们而言，在知识上取得成绩就意味着获得了不仰仗手艺的知识之城——“古老而普遍的学者团体”——的成员资格。

注释：

[1] MS. Lat. n.a.619, ff.28—35.

[2] Supra, p.48f.

[3] Op. cit., III, 441.

[4] Op. cit., III, 435, n.4.

文献简介

为了显示 C·H·哈斯金斯依据哪些资料著文，编者保留 1923 年原版文献简介中罗列的所有书目和文章的做法似乎是可取的。哈斯金斯提及的 1923 年以后的著作或再版著作，编者一律使用方括号指代，哈斯金斯就最重要话题所讨论的一些出版于 1923 年以后的书或文章，编者也补充在文献简介里了。编者还完善或修改了少数几个文献资料，不过没有使用方括号表示这些变化。——
T·E·莫姆森

I

[综合类书目可以参阅 G.C.Boyce 的 “American Studies 95 in Medieval Education”，*Progress of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XIX (1947)，6—30.]

中世纪大学的代表性著作是 Hastings Rashdall 的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Oxford, 1895), 我对这本著作的参考显然贯穿始终; [F.M.Powicke 和 A.B. Emden 修订了 Rashdall 的这本至今依然绝对必不可少的参考性著作, 3 vols.(Oxford, 1936)].

[另见 S.D'Irsay 的 *Histoire des Universités Françaises et étrangères*, vol. I: *Moyen Age et Renaissance* (Paris, 1933); N. Schachner 的 *The Mediaeval Universities* (New York, 1938). 1929 年之前的作品可以参考 L.J.Paetow 的 *A Guide to the Study of Medieval History* 的修订本, (New York, 1931)].

重要资料的译文现在很方便得到, 参见 D.C.Munro 的 *The Mediaeval Studen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ranslations and Reprints, vol. II, no.3; Philadelphia, 1899); A.O.Norton 的 *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Mediaeval Universities* (Cambridge, Mass., 1909); [与大学有关的原始资料的译文现在也可以获得, 其中最有价值的资料收集参见 L. Thorndike 的 *University Records and Life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1944)].

描写博洛尼亚大学的作品有 *Chartularium Studii Bononiensis*; *Documenti per la storia della Università di Bologna dalle origini fino al secolo XV* (1907 年以后), 以及一个专门的丛书系列 *Studi e Memorie per la storia della Università di Bologna* (1907 年以后); [另见丛书系列 *Universitatis Bononiensis*

Monumenta (1932 年以后)]关于该时期大学自治史的研究参见 A.Hessel 的 *Geschichte der Stadt Bologna von 1116 bis 1208*(Berlin, 1910).[最新的大学史研究见 A.Sorbelli 的 *Storia della Università di Bologna: Il medioevo*(Bologna, 1940)和 C. Calcaterra 的 *Alma mater studiorum: L'Università di Bologna 97 nella storia della cultura e della civiltà*(Bologna, 1948)].

关于萨莱诺大学的最新阐释可参考 Giacosa 和 Sudhoff 的研究以及 Sudhoff 学生的论文; [另可参考 P.O.Kristeller 的文章, “The School of Salerno: Its development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learning,”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XVII(1945), 138—194]; 有关萨莱诺大学的最重要的作品是 *The School of Salernum*, 可以参阅伊丽莎白女王时期 John Harrington 爵士编订的精装本, 此书再版时(London, 1922), F.H.Garrison 为它作了精彩的批注, Francis R.Packard 为它作了一个价值不甚大的序。

现代的历史学者仍然很少关注巴黎大学史。[可以参照记述巴黎大学及其学院的一些非常有用的文献目录, A.L.Gabriel 已将它们编辑成书, 见 *Student Life in Ave Maria College, Mediaeval Paris: History and Chartulary of the College (Notre Dame, Ind., 1955)*; 一般性介绍参见 J.Bonnerot 的 *La Sorbonne: Sa vie, son rôle, son oeuvre à travers les siècles*(Paris, 1927), 另可参阅 L.Halphen, P.Glorieux, G.Dupont-Ferrier, G.Le Bras 和 C.Samaran 的文章, 分别收录在 J. Calvet 编辑的 *Aspect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中,

(Paris, 1949); 有关巴黎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同乡会”制度见 G.C.Boyce 的 *The English-German Nations in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during the Middle Ages*(Bruges, 1927), 另见 P. Kilbre 的 *The Nations in Mediaeval Universities* (Cambridge, Mass., 1948); 之于原始资料, 可以参阅 H.Denifle 和 E. Chatelain 编辑的 *Chartularium Universitatis Parisiensis* (1889 年以后) 和 *Auctarium Chartularii Universitatis Parisiensis* (1893 年以后)]。

关于剑桥大学的代表性著作仍然是 J.B.Mullinger 的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Royal Injunction of 1535*, vol. I (Cambridge, 1873)。

至于牛津大学, 可以从 Rashdall 的著作中获得最充分的了解, 另外可补充上几个学院的历史, 剑桥大学也是如此。[参照 C.E.Mallet 的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vol.I: *The Mediaeval University and the Colleges Founded in the Middle Ages*(London and New York, 1924); 另见 1949 年出版的几篇非常有启发意义的文章, 收集在 F.M. Powicke 的 *Ways of Medieval Life and Thought*(London, n.d.) 里, 包括 “Bologna, Paris, Oxford: Three studia generalia” (pp.149—179); “Som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the medieval university” (pp.180—197); “The medieval university in Church and society” (pp.198—212); “Oxford” (pp.213—229)]。

[关于早期大学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可以参考 C.H. Haskins 的 *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Cam-

bridge, Mass., 1928); G. Paré 的 A. Brunet and P. Tremblay, *La renaissance du XIIe siècle: Les écoles et l'enseignement* (Paris and Ottawa, 1933); P. Delhay 的 “L'organisation scolaire au XIIe siècle,” *Traditio*, V (1947), 211—268; E. Panofsky 的 “Renaissance and Renaissance,” *Kenyon Review*, VI(1944), 201—234; W.K. Ferguson 的 *The Renaissance in Historical Thought* (Boston, 1948), 99 尤其是 ch.XI].

II

中世纪知识内容研究最有价值的综合性著作是 Henry Osborn Taylor, *The Mediaeval Mind* [4th ed., 2 vols. (Cambridge, Mass., 1925, and later reprints)]; 另外可以参阅 F. B. Artz 的 *The Mind of the Middle Ages, A.D. 200—1500: A Historical Survey*, 2nd ed. (New York, 1954), 此书的参考书目非常有价值; 有关中世纪早期知识状况研究见 M. L. W. Laistner, *Thought and Letters in Western Europe, A.D. 500—900*, 2nd ed. (London, 1957)].

另可补充以 R. L. Poole 的 *Illustr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Mediaeval Thought and Learning*, 2nd ed. (London, 1920); M. Grabmann 的 *Geschichte der scholastischen Methode*, 2 vols. (Freiburg, 1909—1911); [现在也可参阅 Grabmann 的 *Mittelalterliches Geistesleben* 和 *Abhandl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Scholastik und Mystik*, 3 vols. (Munich, 1926—1956);

M.de Wulf 的 *History of Mediaeval Philosophy*, vol. I, 译自 E.C.Messenger 编订的第六版法文书(New York, 1952); E. Gilson 的 *History of Christian Philosophy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1955)].

J. E. Sandys, *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vol. I, 3rd ed.(Cambridge, 1921); [G.Highet,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1949); R.R.Bolgar, *The Classical Heritage and Its Beneficiaries* (Cambridge, 1954)].

- 10 L.Thorndike,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6 vols. (New York, 1923—1941); P.Duhem, *Le systeme du monde de Platon a Copernic*, 5 vols. (Paris, 1913—1917); C. H. Haskin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aeval Science*, [2nd ed.(Cambridge, Mass., 1927); G. Sarto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3 vols.(Baltimore, 1927—1948); A.C.Crombie, *Augustine to Galile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D. 400—1650* (London, 1952)].

参照数学、医学和法学史的代表性著作[如: D.E. Smith 的 *History of Mathematics* (Boston and New York, 1923—1925); D. Riesman 的 *The Story of Medicine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1936); A.Castiglioni 的 *A History of Medicine*(New York, 1941); P.Vinogradoff 的 *Roman Law in the Middle Ages*, 2nd ed.(Oxford, 1929); Q.Breen 的 “The twelfth-century revival of the Rowan Law, ” *Oregon Law Review*, XXIV(1944—1945), 244—287].更专门性的作品参

见 L.J.Paetow 的 *Guide to the Study of Mediaeval History*, 包括 Paetow 自己的研究性著作 *The Arts Course at Medieval Universit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Grammar and Rhetoric* (Urbana, Ill., 1910), 另见他主编的英译本的 Henri d'Andeli 的 *La bataille des VII arts* (Berkeley, Cal., 1914).

Abelard 的 *Sic et Non* 的样本可参见 A.O.Norton 的 *Readings*, pp.19—25. Abelard 的方法可以进一步参考 B.Geyer 第一次编辑的逻辑学著作, *Peter Abaelards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4 vols. (Munster, 1919—1933); [另见 J. 101 G.Sikes 的 *Peter Abailard* (Cambridge, 1932)].

[关于索尔兹伯里的约翰, 现可参阅 C.C.J.Webb 为其写的传记, (London, 1932), 这是一部公认的权威性著作, 另外可以参阅 H.Liebeschuetz 的 *Medieval Humanism in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John of Salisbury* (London, 1950)].

[关于哈斯金斯在文中讨论的口述者可以参考他本人写的重要文章, “The early ‘artes dictandi’ in Italy,” *Studies in Mediaeval Culture* (Oxford, 1929), pp.170—192; 另见 H.G.Richardson 的 “letters of the Oxford dictators,” *Oxford Historical Society*, n.s., V (1942), 329—450; H.Wieruszowski 的 “Ars dictaminis in the time of Dante,” *Medievalia et Humanistica*, I (1943), 95—108; Wieruszowski 的 “Arezzo as a center of learning and letters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raditio*, IX (1953), 321—391].

关于中世纪大学教室的最经典的描写见 F.Cavazza 的

Le scuole dell' antico studio bolognese (Milan, 1896).

F.Chambon 编订了 Robert de Sorbon 的 *De conscientia* (Paris, 1903).

[关于执教许可证问题可参阅 G.Post 的 “Alexander III, the ‘licentia docendi,’ and the rise of the universities”, C.H. Haskins Anniversary Essays (Boston, 1929), pp.255—277; G. L.Haskins 的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nd the ‘ius docendi,’ ”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VI(1941), 281—292。关于学费问题可参阅 G.Post 的 “Masters’ salaries and student-fees in the mediaeval universities,” *Speculum*, VII(1932), 181—198; G.Post, K.Giocarinis and R.Kay 的 “The medieval heritage of a humanistic ideal: ‘scientia donum Dei est, unde vendi non potest,’ ” *Traditio*, XI(1955), 195—234].

III

关于学生生活的简要概述可参见 Rashdall 著作的最后一章[2nd ed., III, 339—464], 以及小卷本的 R.S.Rait 的 *Life in the Mediaeval University*(Cambridge, 1912); [另见 U. T.Holmes 的 *Daily Living in the Twelfth Century: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s of Alexander Neckam in London and Paris*(Madison, Wis., 1952).

在书中我直接利用了我自己写的有关学生书信的文章(*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III(1898), 203—229), 还有一篇关于巴黎布道文的文章(*ibid.*, X(1904), 1—27); [C.

H.Haskins 在 *Studies in Mediaeval Culture* (Oxford, 1929), pp.1—71 中修改并扩展了这两篇文章, 而且详细介绍了他所使用的原始资料].

从 T.Wright 的 *A Volume of Vocabularies*, vol. I (London, 1857), 120—138 中可最便利地找到 John of Garlande's *Dictionary*; 约翰还写了 *Morale Scolarium* [L.J.Paetow 已将其编辑出版, 书中附有英文释义 (Berkeley, Cal., 1927)].

R.F.Seybolt 翻译并注解了 *The Manuale Scholarium* (Cambridge, Mass., 1921). M.Weingart 编订了 *Statuta vel Precepta Scolarium* (Metten, 1894), P.Bahlmann 将其编辑在 103 *Mitteilung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deutsche Erziehungsund Schulgeschichte*, III(1893), 129—145.[参照 Haskins 的文章 “Manuals for Students”, 转载在他的 *Studies in Mediaeval Culture*, pp.71—91].

有关中世纪礼仪手册的一个经典讨论见 S.Glixelli 的 “Les contenance de table,” *Romania*, XLVII(1921), pp. 1—40.

歌利亚德诗歌的最好收藏本是 J.A.Schmeller 的 *Carmina Burana* (Breslau, 1894); [A.Hilka 和 O.Schumann 已经在着手编辑 *Carminian Burana* 的新的评论版本(既有内容又有评论)(Heidelberg, 1930)].歌利亚德诗歌的最好译本是 J.A.Symonds 的 *Wine, Women, and Song* (London, 1884, 后重版许多次); [现在也可以参见另外的译本, H.Waddell

的 *Mediaeval Latin Lyrics*, 5th ed.(London, 1948 和后来再版本)]以及 F.Whicher 的 *The Goliard and Poets*(Cambridge, Mass., 1949)].

两位歌利亚德诗人已经被个人化, L.Delisle 和 W.Meyer 确定了首席主教, B.Schmeidler 和 M.Manitius 确定了桂冠诗人。关于“歌利亚德”一词的起源可参考 J.W.Thompson 的 *Studies in Philology*, XX (1923), 83—89, 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

关于大量歌利亚德诗歌文献的介绍可参阅 Paetow 的 *Guide*[2nd ed., pp.484f., 489—493]; P.S.Allen 的 *Modern Philology*, V, 423—476 和 VI, 3—43(1907 年和 1909 年); [也可参阅 P.S.Allen 的 *Medieval Latin Lyrics*(Chicago, 1931)]; H.Süssmilch 的 *Die lateinische Vagantenpoesie des 12. und 13. Jahrhunderts als Kulturerscheinung*(Leipzig, 1917).[另见 M.Manitius 的 *Geschichte der lateinischen Literatur des Mittelalters*, vol. III (Munich, 1931), 尤其是 pp.963—984; H.Waddell 的 *The Wandering Scholars*, 7th ed.(London, 1934 和后来的再版本); F.J.E.Raby 的 *A History of Secular Latin Poetry in the Middle Ages*, vol. II (Oxford, 1934)]; J.de Ghellinck 的 *L'essor de la Littérature latine au XIIe siècle*(Brussels 和 Paris, 1946), 尤其是 vol. II, 270—284; 关于奥尔良的首席主教和桂冠诗人参见 K.Langosch 的 *Hymnen und Vagantenlieder*(Basel, 1954), 尤其是 pp.292—340].

[也可参阅最近出版的下列作品: *The Septicentennial*

Celebration of the Founding of the Sorbonne College in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Chapel Hill, N. C., 1953); P. Kibre, "Scholarly Privileges: Their Roman Origins and Medieval Expression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IX(1954), 543—567; F. Pegues, "Royal Support of Students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Speculum*, XXXI(1956), 454—462.]

索 引

- Abelard 阿贝拉尔, 14, 40, 41, 52, 91, 100
 Albertus Magnus 艾伯塔斯·玛格努斯, 49—50
 Alcuin 阿尔克温, 39
 Alfred, king 英王阿尔弗雷德, 3
 Allen, P. S. P·S·阿兰, 103
 Anselm 安瑟伦, 51
 Arabic learning 阿拉伯知识, 5, 34, 53
 Archpoet 桂冠诗人, 83—84, 104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5, 29, 30, 31, 33, 40, 52—53
 Arnold, Matthew, quoted 马修·阿诺尔德, 引文, 22
 Arts, seven 七艺, 4, 27—34
 Averroes 阿威洛伊, 53, 54
 Avicenna 阿维森那, 34

 Bede 比德, 29
 Berlin 柏林, 21
 Bernard of Chartres 沙特尔的伯尔纳, 13, 41
 Besancon 贝桑康, 79
 Bible 《圣经》, 34, 38
 Boethius 博提乌斯, 5, 28
 Bologna 博洛尼亚, 2—3, 6—12, 16, 19, 20, 22, 23, 32, 35, 38, 41—46, 48, 49, 60, 78, 82, 91, 96
 Bonaventura 博纳文图拉, 50

- Books, control of
 Brown University
 Bryce, James, quoted
 Buoncompagno
- Cambridge
 Cathedral schools
 Cavazza, F.
 Chancellor
 Charlemagne
 Chartres
 Chaucer
 Classics
 Class-rooms
 Coimbra
 Colleges
 Corpus Juris Civilis
 Cracow
- Dante, quoted
 Degrees
 Denifle, H.
 Dominicans
 Donatus
 Duhem, P.
- Edinburgh
 Erfurt
 Etienne de Tournay
 Euclid
 Examinations
- Franciscans
 Frederick Barbarossa
 Frederick II
 Freedom, academic
- 书籍审查, 9, 37—39
 布朗大学, 21
 詹姆士·布莱斯, 引文, 24
 邦孔帕涅, 32, 42, 45, 48—49
- 剑桥, 19, 20, 22, 23, 98
 主教座堂学校, 5, 12—14
 F·卡瓦扎, 101
 主事, 14, 15, 34, 46—48, 54
 查理曼, 3, 39
 沙特尔, 13, 29, 40, 41, 78
 乔叟, 5, 30, 38, 65
 古典文学, 29—30, 39—41, 82, 84
 教室, 45—46
 科英布拉, 20, 23
 学院, 18—19, 22—24, 39—61
 《民法大全》, 7, 8, 35, 42—44
 克拉科夫, 20
- 但丁, 引文, 31, 37, 45
 学位, 11, 24
 H·德尼弗莱, 4
 多米尼克修士, 50
 多那图斯, 28
 P·达赫, 100
- 爱丁堡, 21
 埃尔富特, 73
 特内伊的艾蒂安, 51
 欧几里得, 5, 29
 考试, 11, 46—49, 91
- 方济各会修士, 50, 54
 腓特烈·巴巴罗萨, 8
 腓特烈二世, 6, 12
 学术自由, 50—57

- Galen 盖伦, 33, 34
- Galileo 伽利略, 12
- Gerbert 热尔贝, 39
- Germany, Universities and schools of 德国的大学和中学, 20—21, 48, 69—75
- Gilbert de la Porree 拉波里的吉尔伯特, 53
- Gilds 行会, 8—11
- Glixelli, S. S·格里克利, 103
- Glossators 注释法学派, 7—8, 35—36
- Goliardi 歌利亚德, 83—89, 103
- Grabmann, M. M·格拉布曼, 99
- Gratian 格拉提安, 8, 37, 40
- Gregory IX 格雷戈里九世, 15, 37, 51
- Haskins, C. H. C·H·哈斯金斯, 95
- Heidelberg 海德堡, 20, 69—71
- Henri d'Andeli 亨利·当德利, 29, 100
- Hessel, A. A·赫塞尔, 96
- Hildebert 伊尔德贝, 29
- Hippocrates 希波克拉底, 6, 13, 34
- Inception 学位的获得, 48—49, 81, 82
- Irnerius 伊尔内里乌斯, 7
- Jacques de Vitry, quoted 维特里的雅克, 引文, 17—18
- John of Brescain 布雷斯凯恩的约翰, 54
- John of Garlande 加兰的约翰, 42, 67—68, 102
- John of Salisbury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 13, 29, 40—42
- Laon 拉昂, 12
- Latin, use of 拉丁文的使用, 66—75
- Law, Canon 教会法, 8, 13, 16, 30, 36, 37
- Law, Roman 罗马法, 5, 6—12, 16, 30, 35—36, 42—44
- Leipzig 莱比锡, 20, 61

- Letters, student 学生书信, 76—82
- Libraries 图书馆, 2, 37—39
- Liège 列日, 12
- Logic 逻辑学, 30—31, 41, 42
- London 伦敦, 21
- Lorenzo of Aquileia 阿奎莱亚的洛伦佐, 42
- Louvain 鲁汶, 20
- Lowell, J. R.,
quoted J·R·洛厄尔, 引文, 13
- Maitland, F. W.,
quoted F·W·梅特兰, 引文, 7
- Manchester 曼彻斯特, 21
- Manuale Scholarium* 学生手册, 68—70, 91, 102
- Manuals of manners 礼仪手册, 75, 103
- Martianus Capella 马提亚努斯·卡佩拉, 28
- Medicine 医学, 5—6, 13, 16, 34, 35, 97
- Montpellier 蒙彼利埃, 12, 20, 22,
- Munro, D. C. D·C·芒罗, 17, 96
- Naples 那不勒斯, 12, 42
- Nations 同乡会, 16—18
- Nigel Wireker 奈杰尔·怀尔克, 65
- Nominalism and realism 唯名论与唯实论, 56, 69
- Norton, A. O. A·O·诺顿, 40, 96, 100
- Odofredus 奥德弗雷德斯, 42—43
- Orleans 奥尔良, 12, 13, 22, 29—30, 42, 62,
79—82
- Oxford 牛津, 3, 5, 19, 20, 22—23, 38, 39, 54,
61, 65, 77, 96
- Padua 帕多瓦, 10, 12, 20, 22, 23
- Paetow, L. J. L·J·佩托, 96, 100, 102
- Palermo 巴勒莫, 10

- Paris 巴黎, 2—3, 7, 12—21, 22, 23, 30—33, 38, 39, 40, 41, 42, 46—48, 53—55, 62—65, 67—68, 72, 82, 97
- Parody 模仿诗文, 88
- Pavia 帕维亚, 84
- Pepo 佩波 7
- Peter Lombard 彼得·隆巴德, 34
- Philip Augustus 腓力·奥古斯都, 15
- Poetry, student 学生诗歌, 82—89
- Ponce of Provence 普罗旺斯的庞塞, 42, 80
- Poole, R. L. R·L·普尔, 40—41, 99
- Prague 布拉格, 20
- Primate 首席主教, 83, 104
- Priscian 普里西安, 28
- Professors 教师, 9—11, 39—57
- Ptolemy 托勒密, 5, 29
- Quadrivium 四艺, 4, 27
- Rait, R. S. R·S·雷特, 102
- Rashdall, H., quoted H. 拉什达尔, 4, 96—97; 引文, 18, 20, 23, 25, 35—36, 44, 89, 90
- Raymond, Master 马斯特·雷蒙德, 54
- Renaissance, of 12 世纪文艺复兴, 4—8, 82, 83
twelve century
- Richer 里歇尔, 13, 39
- Robert de Sorbon 索邦的罗伯特, 19, 23, 46—48, 91, 101
- Ruprecht 鲁普雷希特, 20
- Rutebeuf 吕特伯夫, 65
- Salamanca 萨拉曼卡, 20
- Salerno 萨莱诺, 5, 6, 20, 21, 82, 97
- Sandys, J. E. J·E·桑兹, 99
- Savigny, F. K. von F·K·冯·塞维格尼, 44
- Schools, cathedral, 主教座堂学校, 12—24; 文法, 71—75
grammar

- Sermons, Paris 巴黎, 布道文, 62—65
 Socrates 苏格拉底, 1
 Sorbonne 索邦, 18—19, 24, 46
 Spain 西班牙, 5, 12, 19
 Strasbourg 斯特拉斯堡, 21
 Students; letters by; 学生, 8—11, 59—93; 学生写的信件,
 manuals for; poems 76—82; 学生手册, 66—75; 有关学生的
 concerning; sermons 诗歌, 65, 66, 82—89; 有关学生的布
 concerning 道文, 62—65
 Sudhoff, K. K·萨德霍夫, 97
 Sussmilch, H. H·萨斯米尔克 103
 Symonds, J. A. J·A·西蒙兹, 82, 84, 103
- Taylor, H. O. H·O·泰勒, 39, 99
 Text-books 教科书, 27—39
 Theodosius II 狄奥多西二世, 3
 Theology 神学, 8, 16, 19, 34, 52—57
 Thomas Aquinas 托马斯·阿奎那, 40, 49, 53
 Thompson, J. W. J·W·汤普森, 103
 Thorndike, L. L·桑代克, 100
 Toledo 托莱多, 82
 Toulouse 图卢兹, 33
 Tours 图尔, 39, 82
 Trivium 三科, 4, 27
-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美国大学传统, 21—25, 92
 tradition in,
 Universities, characterized 大学, 特征和定义, 2, 3, 5, 8, 9; 数
 and defined; number of, 量, 20, 21; 起源, 2—20; 学习, 27—
 origin of; studies of, 37; 教学, 39—57; 传统, 21—25
 teaching in; tradition of
- Vienna 维也纳, 20
 William of Conches 孔什的威廉, 41